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Irregular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277期

目录

【专稿】

单少杰 “妄议”现时中国国际境遇（上）

——简述民主制国家与极权制国家的百年对峙

【往事】

刘家驹军旅纪实两篇

1. 我军的武装征粮——革命党代替了刮民党

2. 杀俘虏 壮胆气——攻陷“土围子”之后

【人物】

施滨海 华国锋为什么选择辞职（一）

——邓小平擅权的战略布局

于向真 军代表门双成

刘家驹 贫穷逼出来的“抠八”

——某军宣传干事常仁琐记

【评论】

何与怀 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说起

【序跋】

鲍 彤 谁在分裂党？——《绕不过去的点》读后

朱 正 国际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绕不过去的点》序

【读者来信】

1. 张从纠错

2. 张晓良指漏

3. 蒋健匡正

4. 冯锡刚勘误

【本刊声明】

“妄议”现时中国国际境遇（上）

——简述民主制国家与极权制国家的百年对峙

单少杰

一、引言

自2018年3月起，笔者有感中国人大会议堂里发生某些异动，某些因废除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而致使国家权力更趋集权化的异动，不禁浮想联翩，先是往近处想这几年来的“新时代”，继而往远处想这四十年来的“中国改革史”，再继而往更远处且更广处想这一百多年来的“世界近现代史”。想来想去，笔者逐渐形成一些看似天马行空，至少在笔者看来不无道理的看法。

此后不久，在世界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也相应发生一些异动，一些似乎是为了针对中国异动而发生的异动，或说是为了遏制中国异动而发生的异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笔者所形成的那些看法。于是，这又激励笔者进一步思考这些异动，这些由中国引发并在中国与世界间作相向运动的异动，并因此而又更进一步形成一些看法，一些既立足于中国看世界又立足于世界看中国的看法。

概略地说，笔者的这些看法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描述性内容，即描述一种曾经发生并很可能还会发生的国际现象，也就是有关民主制国家曾屡屡结盟以围剿极权制国家这一国际现象；二是解释性内容，即解释这种曾经发生并很可能还会发生的国际现象何以产生的主要缘由，也就是有关民主制国家曾屡屡结盟以围剿极权制国家这一国际现象何以产生的主要缘由。

显然，上述描述性内容属于直接性经验范畴，故可用较直白的陈述方式来加以呈现；而上述解释性内容则属于间接性推理范畴，即主要探讨上述直接性经验背后的因果关系，故需用较严密的论证方式来加以揭示。本文是首谈这些看法，故选择先易后难的论述途径，先谈谈其描述性内容，即只是较简约地描述有关民主制国家屡屡结盟以围剿极权制国家这一国际现象。

这一描述性内容本身也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回顾性内容，即回顾过往已确实发生的历史现象，也就是诸多民主制国家曾屡次结盟以围剿某些极权制国家的

历史现象；二是展望性内容，即展望日后或许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情景，也就是或许有可能发生诸多民主制国家将再次结盟以围剿或围堵某些极权制国家，比如现时中国的未来情景。

二、回顾（上）

在这一百来年的时间里，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星球已先后发生三次波及全球的大战，即两次波及全球的“热战”和一次波及全球的“冷战”。前两次波及全球的“热战”，即发生在1914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发生在1939至1945年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以大量炮火和大量生命作为最基本的冲突手段。后一次波及全球的“冷战”，即发生在1947至1991年间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的对峙，只是以相互隔绝和相互遏制作作为最基本的对抗方式。

三次波及全球的大战尽管在许多重要方面，比如在大战的酝酿过程、爆发方式、对抗规模、激烈程度、结局形式以及后续影响等重要方面，都不尽相同；但在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事关整个大战发生发展的基本态势方面，都颇为相似。

那么，这个基本态势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基本态势呢？概括地说，就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诸多民主制国家，一方面在他们彼此间结为那种既拥有共同利害关系又拥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全方位盟友，或说是那种既维护各自国家利益又维护自由民主理念的全方位盟友；另一方面又拉着一个或数个极权制国家作为那种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权宜盟友，或说是那种“敌人的敌人即朋友”的权宜性盟友；并据此结成一个既同仇敌忾又同床异梦的国家集团，来共同抗衡另一个以某些极权制国家（或为君主独裁式极权制国家或为一党专政式极权制国家）为首的国家集团；最终通过或为非常炽烈的“热战”方式或为非常严峻的“冷战”方式，一举击败了那个敌对的国家集团，并一举完灭了其中那些为首的极权制国家。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的基本态势，就是一帮民主制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方面在他们彼此间结为那种既有共同利害关系又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全方位盟友，另一方面又拉着一些极权制国家如俄罗斯帝国和意大利王国作为那种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权宜性盟友；并据此结成“协约国”阵营（按：俄罗斯帝国后因爆发“十月革命”而退出），¹来共同

¹ 在此“协约国”阵营内，还应包括一个位于远东地区的极权制国家即日本帝国。因为，该极权制国家不只是通过签订条约的方式来加入“协约国”阵营；还通过直接参战的方式，即通过直接攻占德意志帝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地的方式，来加入“协约国”阵营。不过，该极权制国家的这种加入方式犹如趁火打劫，或说是“捡洋落”，带有很大的投机性，故未能被视作“协约国”阵营内的主要成员国。

抗击“同盟国”阵营，即以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这两个极权制国家为首的“同盟国”阵营；通过四年极为血腥的全球性战争，最终一举击败了这个敌对国阵营，并一举完灭了其中那两个为首的极权制国家。

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的基本态势，仍旧是一帮民主制国家如美、英、法（后由其流亡政府代表）、加、澳等国，再加上一些受侵略国家如中华民国，一方面仍在他们彼此间结为既有共同利害关系又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全方位盟友，另一方面仍又拉着一些极权制国家如苏联等国作为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权宜性盟友；并据此结成“同盟国”阵营，来共同抗击“轴心国”阵营，即以德意志第三帝国、日本帝国和意大利王国这三个极权制国家为首的“轴心国”阵营；通过六年极为血腥的全球性战争，最终一举击败了这个敌对国阵营，并一举完灭了其中那三个为首的极权制国家。

又如，全球性冷战（Cold War）的基本态势，仍旧是一帮民主制国家如美、英、法、加、澳等国，再加上一些由二战战败国转型而来的民主制国家如德、意、日等国，一方面仍在他们彼此间结为既有共同利害关系又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全方位盟友，另一方面仍又拉着一些极权制国家如红色中国作为只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权宜性盟友；并据此结成一个带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国家阵营，来共同对抗另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国家阵营，即以苏联这个极权制国家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通过近四十四年非常漫长且非常严峻的全球性对峙，最终一举击败了这个敌对阵营，并一举完灭了其中那个为首的极权制国家。

三、回顾（下）

上述可见，三次全球性大战的基本态势都颇为相似，都是由一个其主要成员多数为民主制国家，少数为极权制国家的国家集团，来共同对抗并最终击败另一个其主要成员全部为极权制国家的国家集团。

进而言之，在上述三次全球性大战中，那些参战的民主制国家特别是处于领导地位的民主制国家，都持有两个不同层面的价值取向：一是有关功利层面的价值取向，即竭力追求各自国家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一是有关道义层面的价值取向，即决意推动自由民主理念普适化的价值取向。

基于前一层面的价值取向，那些参与战事的民主制国家不仅都竭力维护各自非常不同的国家利益（即都有些各怀私心），还都竭力采用各种非常有效的权谋

手段（即都有些不择手段）；并因此而使他们所参与的那些全球性大战染上了许多较为灰暗的色彩，比如那种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色彩和那种较为庸俗的实用主义色彩。

基于后一层面的价值取向，那些参战的民主制国家又都怀有某种使命，某种坚守自由民主理念以反对专制极权国家的使命；并因此而又将他们所参与的那些全球性大战提升为一种带有某种道义诉求的全球性大战，即由诸多民主制国家聚义结盟以彻底围剿某些极权制国家的全球性大战。

2018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周年，不免引发人们再次去思考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重大历史意义。

按照马列主义教科书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属于那种“帝国主义战争”（按：其主要观点源自列宁相关著述），即属于那种发生在帝国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就是那种其本身毫无正面价值的所谓“狗咬狗”的战争。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只是有帝国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战争（即所谓“狗咬狗”）的一面，还有民主主义国家与极权主义国家（或说是民主制国家与极权制国家）进行战争（亦可谓“人灭狗”）的一面。

就参与此次大战的民主制国家（如美、英、法等国）方面来看，既有其功利方面的价值诉求，即为了守护其已占据的利益版图而必须遏制那些虎视眈眈的觊觎者，也就是正处于急欲扩张期的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又有其道义方面的价值诉求，即为了捍卫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理念而必须抗拒专制极权制度，也就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正在实行的那种国家制度。

天佑善业，参与此次大战的民主制国家最终成功地捍卫了其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理念，并守护了其已占据的利益版图，与此同时，也彻底剿灭了敌对阵营中的那些为首的极权制国家。

因此，人们有理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少拥有这样一个重大历史意义，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开启了一个历史进程，一个不断有民主国家结盟以围剿极权国家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一个此后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性冷战相继做出类似事业的历史进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至暗时刻”，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曾发表过一系列既富有功利性又充满道义感的演讲。在1940年5月13日就任英国首相的演讲中，丘吉尔既非常直白地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夺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不

能生存”“就不复有大英帝国”“就不复有大英帝国所代表的一切”；又非常神圣且庄严地宣称：要“尽上帝赋予我们的全部力量去战斗，同人类黑暗、可悲的罪恶史上空前凶残的暴政战斗。这就是我们的政策。”²

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苏德战争爆发当日的演讲中，丘吉尔坦言：“在过去 25 年中，再没有人像我这样始终一贯地反对共产主义了”“但是，所有这一切与正在我们眼前展现的情景相比，都黯然失色了”“连同它的罪恶、它的愚蠢和悲剧，都一闪而逝了。”因为，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十恶不赦、杀人如麻、欲壑难填的魔鬼”，即希特勒及其纳粹暴政；因此，“任何同纳粹政权战斗的人或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任何与希特勒同流合污的人和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显然，在他的这番演讲中，既有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也有痛斥法西斯反人类罪行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但战火还未燃及美国时，罗斯福总统就已超越美国一国之私利而关注整个世界之命运，既关注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战场，并通过大西洋航线大量援助那些正与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作战的国家；与此同时，他又关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战场，并通过滇缅公路积极援助这个正与法西斯日本苦战的国家。

在 1941 年 1 月 6 日国会的演讲中，罗斯福总统又提出“期待”在“世界各地”实现“四大自由”，⁴即“言论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富有国际道义的“世界秩序”。

反观今日美国，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其实质就是只关注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而无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诉求，或说是只看重美国对外关系的功利取向而漠视美国对外关系的道义取向，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规避了其前辈总统罗斯福曾确认承担的国际责任，即竭力伸张国际道义的国际责任。

在冷战时期，最能聚焦东西方两大阵营是如何进行严重对峙的地方，莫过于那道横亘在东柏林与西柏林之间的“柏林墙”。这道大墙始建于 1961 年，全长 155 公里，其主要功能不是用于防范外部敌人而是用于防范本国人民。这道大墙自建立之日起，就成为东西方两大阵营进行冷战的前沿阵地，并因此而成为美国

² 《永不屈服——温斯顿·丘吉尔一生最佳演讲集》（李阳编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79-181 页。

³ 同上，第 257-261 页。

⁴ 参见资中筠：《美国十讲》第四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5-92 页。

总统屡屡抵达的地方，即屡屡在此发表演讲以阐释美国价值理念的地方。

1963年6月26日，第一位抵达柏林墙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西柏林市政厅发表演说：

——自由常经磨难，民主亦非坦途。但我们绝无必要竖起高墙，禁锢人民，囚之圈之，患其叛离。

——柏林墙就是共产主义体制失败最生动的证据。因为，柏林墙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更是对人性的戕害。它让家庭分离，妻离子散，让手足异处，挚友失群。

——自由不可分割。倘一人为奴隶，则举世无自由。当我们都得到自由之时，我们便可翘首企盼这座城市合二为一，这个国家、整个伟大的欧洲大陆沐浴和平与希望之光。

他还非常诗意地向这堵墙里面的许许多多柏林人表达支持：

——你们居住在一个固若金汤的自由之岛中，但你们的生命仍与岛外的千千万万人融为一体。

——全世界所有的自由人，不管身居何处，都是柏林市民！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我无比自豪地说：我是一个柏林人！

1987年6月12日，最后一位即第四位抵达柏林墙的美国总统里根在勃兰登堡门前发表演说：

——在经历冷战四十年之后的今天，在整个世界面前，耸立着一个伟大和必然的结论：自由导致繁荣，自由用礼让和宽容代替了各国之间古老的仇恨。自由是胜利者！

——只有当新闻记者被赋予言论自由的时候，真相才会浮现；只有农民和商人能够享受到经济自由的时候，繁荣才会到来。

——在我身后耸立着的这堵墙，仍然限制着人们的出行自由，仍然把极权主义国家的意志强加于每一个普通男女之上。

——这堵墙终将倒下，因为，它经不起良知的考验，它经不起真理的追问，它经不起自由的期望！

他还非常高调地向这堵墙对面的那位最高领导人发出呼吁：

——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如果你真的在寻求和平，如果你真的在寻求苏联和东欧的繁荣昌盛，如果你真的在寻求自由化，那么，到这扇门前来吧。戈尔巴乔夫先生，把这扇门打开！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

当然，上述民主制国家在对抗极权制国家时，除了很看重道义层面的价值取向外，也很看重功利层面的价值取向，即所谓“两利相衡取其重”或“两害相衡取其轻”的价值取向，其间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将“敌人的敌人”视作“一时的盟友”。

例如，在“一战”中，将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的“沙俄”视作“一时的盟友”，以借助后者倾其国力来大量牵制前者部署在东部战线的作战力量，即由上百万精锐德军所形成的作战力量；另外，还将作为“德意志帝国”的敌人的日本视作“一时的盟友”，以借助后者动用其陆海军来彻底拔除前者部署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据点，如部署在中国青岛的战略据点。

又如，在“二战”中，将作为“纳粹德国”的敌人的“苏俄”视作“一时的盟友”，以借助后者倾其国力来大量摧毁前者部署在东部战线的作战力量，即由数百万精锐德军所形成的作战力量。

又如，在“冷战”中，将作为“红色苏联”的敌人的“红色中国”视作“一时的盟友”，以借助后者倾其国力来大量牵制前者部署在远东地区的防卫力量，即由上百万精锐苏军所形成的防卫力量；另外，还借助后者打着“反霸”旗号来大力削弱前者已积存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已积存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影响力。

并且，这些“一时的盟友”还会因改变其功利取向而改变其身份归属，比如变“此一时的盟友”为“彼一时的对手”。

例如，日本在“一战”时，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如要争夺对中国青岛地区的控制权，而成为英美等民主制国家的盟友；但到了“二战”时，又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如要争夺对整个远东地区的控制权，而又成为英美等民主制国家的对手，并且是最凶恶的对手之一。

又如，苏联在“二战”时，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如要抗击纳粹德国的入侵并维持苏俄政权的生存，而成为英美等民主制国家的盟友；但到了“冷战”时，又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如要争夺对欧洲地区的控政权以及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力，而又成为英美等民主制国家的对手，并且是最主要的对手。

又如，中国在“冷战”时，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如要抗衡来自苏联的急剧上升的战争威胁，即可能由低烈度的边境冲突急剧上升为高烈度的边境战争乃至超高烈度的“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而成为美国等民主制国家的盟友；后又

在其“改革开放”时，继续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如要引进用于发展中国经济的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以及科学管理方法，而继续成为美国等民主制国家的盟友；但到了中共十八大和十九大时，即进入所谓“某某某新时代”，似乎又因其在功利方面的诉求，即要尽可能地扩大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或是尽可能地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或是尽可能地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而又成为美国等民主制国家的手，并且是最主要的手。

【往事】

我军的武装征粮

——革命党代替了刮民党

刘家驹

重庆刚解放，进入四川的人民解放军，都要到这座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来吸收一批小知识分子。重庆的110多所大中学校的布告栏里，三天两头就有军政干部学校的招生广告，内容大体是，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有志报名投效的，须经家长、学校的同意，考试录取入校后进行军政培训，学食杂费全免，还每月发给学员津贴，结业后分配到部队担任各种职务。这一征召很有吸引力，我就读的南林中学，不到半个月就招走三批，上课时班里的座位空了一半。大势所趋，我也认定当兵是良策，既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提前谋得一份公职。我到35师的干校招生处报了名。

一

考试那天，附近7所院校200多学生都集中在我学校的礼堂，试卷两张纸，有名词解释和问题回答。如，说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你是怎样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你的志向是什么？

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回答一般的社会问题和形势，都能粗略应对，只有名词解释让我犯难。我偷瞄邻座的试卷，他在“布尔乔亚”后面写下“这是个政治经济学名词”，对“阶级”的解释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如军队的连长排长，或工厂的厂长科长。我照抄不误。交卷时，我随其后观察他，年纪和我相仿，十七八岁，矮胖，戴了副深度眼镜。我对他笑了笑，以示谢意。

第二天发榜，在录取的 35 人中，我是倒数第五名。

又过了一天，来了两名军人，召见我们学校被录取的七名同学，要我们马上入伍。我急忙回宿舍把被子衣物打成捆，给家人发信，说我已参加人民解放军了，让他来取走我留下的行李。

就在这天下午，我们一行给带到土桥镇一家大院，军干校从各地招来的新生都集中在这里，100 多人编成三个区队，大学生为一区队，中学生为二区队，女生为三区队。

没想到，考试时邻座的那个小胖墩也来了，还跟我编到一起的第六班。他一见我就像见了熟人，兴奋地告诉我，他叫姬云，父母坚决不让他参军，把他关在屋里，母亲哭红了眼，他是半夜逃离的。

我被姬云的行动感染了，说：“你比巴金《家》里的觉慧还伟大。”

傍晚给我们发放棉军服，我俩都争着挑小号的，左挑右选，穿上身还是大了一圈，把裤腿挽起，勉强强像个军人。

班长是浙江入伍的，要我们晚上开个班务会，谈自己的家境和个人简历。他借来房东的大脚盆，直径有一米多，盛上副班长烧的一大盆热水，全班十个人围坐在盆边，边烫脚边开会，方法新鲜，唤起我们说话的热情。

姬云激动的第一个发言：“我是璧山县人，是个八百多担租的大绅粮，父亲在重庆做酒生意，是川康银行刘航深的股东。我弟兄仨，大哥是国民党空军机场的上尉机械师，跟国民党去了台湾。二哥在南京上大学，我在学校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青社，我是为共产主义理想来当兵的。姬云还说自己性格强，好跟人抬杠，出语伤人，今后大家要多多包涵。姬云的自我介绍明迹坦心，一圈人搅动水的脚停止了，眼睛都望他那张胖乎乎的小脸——他已经不再像是个孩子了。

这时，35 师组成璧山军分区，战斗部队都在军分区所属的铜梁、璧山、大足、荣昌、永川、江津等县，展开剿匪。军干校拉到永川县开始了政治教育，由师宣传科长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一天，我们正出早操，城外枪声大作，是土匪攻城，我们给带到住地后面的小山上的竹林里隐蔽。仅个把时辰，土匪就给打垮了。

一千余人土匪来攻打永川城，城里只有一个警卫排和担架连，再就是我们教导队一帮手无寸铁的新兵。这帮土匪由一个“一贯道”的点传师组织指挥，他们都喝了朱砂酒，神志迷茫，人人手握一把大刀，口念咒语，神神乎乎地向城里冲

来。留守的师副参谋长不信邪，带警卫排和担架连和土匪对抗。土匪虽神勇，到底是乌合之众，我们人数虽少，都有战争经历，战斗仅几个小时，大刀片子是敌不过冲锋枪的。击毙匪徒41人，我军伤亡11人。

师政治部抓住这一胜利的机遇，宣传我军的强大和威慑力，就在公园布置了展览。正是星期天，教导队学员三三两两的自行前往参观，我和姬云一起去了。在公园中央的广场上，摆列了四排土匪的尸体，都是浑身血污，瞪眼咧嘴的，形象十分可怕。

在广场边的一排平房里，传来呼天唤地的哭喊声。我和姬云赶过去一看，一百多土匪伤员，正在由县医院和师门诊部的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在公园西侧长长的花廊里，席地坐满了被反绑双手的俘虏，由警卫排的战士看守着，约300多人。当我和姬云走到他们中间，土匪们一个个都仰头怒目而视。

我见一个中年匪徒面善，便在他身边蹲下，问：“你是哪个乡的？”不答，又问：“你们为什么要来打我们？”

对方突然火起：“是我们打你们？你们不先动手，我们会还手？”

周围的匪徒都靠了过来声讨：

“告诉你这个小共产党，我们不是土匪，是老实巴交乡里人，是你们的工作组把我们逼的没法子了，才和你们对着干的。”

“国民党给赶走了，还以为你们真是李闯王，哪有这么好的事哟。共产党才来几天，屁股还没坐热，就迫不及待地向老百姓要粮。”

“过去，我们叫国民党是刮民党，现在呢，该叫你们是刮命党了。”

这帮人上断头台还如此猖獗，我心中怒火升起：“你们都听着，谁反抗共产党，就去丰都城见阎王。”

姬云不再让我说下去，拽了我一把：“走吧。”

我给他拉出公园大门，火气还未消，姬云说：“你听了看了，明白吗？他们不是匪帮，都是有思想的农民。”

“你怎么这样说啊。”

“要是真正土匪，求生心切，哪会对你恶言恶语？前些年，我乡下的家，县里下来加收赋税，被佃户们撵走了。这些人上山落草，都是乱收粮款引起的。”

“那是反国民党啊，现在竟然敢反共产党？”

“真要是我们党的政策跟国民党一样，农民就会用锄头把共产党赶出川。”

在回队的路上，姬云像是心事重重，说：“你陪我去一趟我二舅家。”

“你在永川还有一门亲戚？”

“我二舅家就在城里，他受我母亲之托，今晚要接我走。”

“开小差？”我惊恐，“那得了，抓回来要枪毙的！”

“璧山那边已来人等着我走，二舅要我马上表态，我要你一起去帮我说说。”

姬云又说，他二舅是中央大学毕业的，对共产党有看法。

我们走进一条巷子深处的一家院落，两进门，很宽敞。在堂屋见了姬云二舅。他 50 开外，一脸络腮胡，胖胖的，穿了件阴丹蓝长衫。

姬云向二舅介绍我：“这是我同班战友，重庆人。”

二舅点了点头就说开了他的正题：“云云，你娘决心已定，无论如何你得马上走，形势很危急，棒老二还会来的，璧山老家那边给你准备了一抬滑竿，来的人脚力好。你娘说了，先回重庆，待不住就去上海，或去美国。远走高飞谁也奈何不了你。”二舅又说，“你出身地主兼资本家，在共产党军队是待不长久的。我认为，你娘的安排很合适，不要让你妈伤心，你要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你好好想想吧。”

“你要帮我妈的忙，不会绑架我走吧？”

姬云的调侃引起二舅笑了：“那该怎么办你？”

“好办，我给妈写信，就说你二舅已经仁至义尽了。”

“听听我的忠告吧，国民党走之前，永川就给他们把田赋收到民国 48 年了（公元 1959 年），老百姓已是困苦不堪，共产党来了，要安抚民心，就应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没想到，他们一进来要的粮还比国民党多，拿不到粮就抓人，要活命就得拼命，你看看，光永川四乡，到处是梁山。我支持你娘的做法，她要你走向自由世界，那里天高地阔，可以发挥你的才干，你想留在共产党的圈子里，就凭你的地主资本家出身，只能干耗你一辈子。”

“二舅，我也忠告你”姬云已不顾长辈颜面：“你要不改变你的反动立场，你也难在新社会生存。我有我的人生道路，走革命的大路是不会回头的。”

二舅没词了，无奈地说：“好，好，十头牛也拉不回你了，好自为之，去走你的路吧。”

二舅进屋拿来文房四宝，姬云扶在桌上，用毛笔疾书了两页纸装进信封，写上“母亲大人亲收，儿姬云跪禀”交给了二舅。

我和姬云告辞出来，在院子见到一乘带篷的滑竿靠在墙角，姬云说：“要是今晚我坐上它，也许就跟你永别了。”

回到教导队，我一五一十地把姬云拒绝当“逃兵”的事，向班长做了报告。第二天，教导队集合早点名，队长站在队前对姬云做了专题表扬。说他立场坚定，不为家庭诱惑，已具有革命军人崇高的品质，要求全队向姬云学习。青年团组织也来找他谈话，填了组织发展对象表。

姬云在我们这批重庆入伍的兵中，已成了一颗耀眼的明星。

三

匪情越演越烈，从敌情通报中得知，永川各乡土匪已聚集三万多人，教导队再不能闭门论道了，受命和战斗部队一起清剿土匪。

我们这群刚穿上军装的学生兵，没有一点使枪弄炮的本领，上阵前，师派出警卫排给我们搞了三天的战术教练，如利用地形地物、出枪、射击、卧倒、起立、冲击。最后，还让我们对着山壁的石灰圈打了三枪，于是，我们就成了武装战士。

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在临江场的一片石谷子滩上。那里有座独立的地主庄园，有石墙，有碉楼，一股有枪有炮的土匪坚守在那里。我们教导队把他们团团围住，就是不敢攻击。

队长是战争过来人，他看到庄园前后都是开阔地，我们这帮半拉子兵冲上去就是送死。他派出通信员求援，找来了一个战斗连队，战斗连身手不凡，攻击有序，在小炮、机枪的掩护下，动作敏捷，冲到院墙根的一个班，迅速投出一排手榴弹，硝烟还未散，碉楼里就伸出了白旗。

从大院里押出的俘虏有23人，穿的是国民党军装，原来是国民党正规军垮下来的一个建制排。

姬云说：“幸好队长冷静，硬是要让我们冲锋陷阵，全给打趴了，赔了命还得了胜利。”

第二次战斗更出奇。

一天，有三支部队一起宿营跳石乡。从泸州过来第10军的一个连住在场尾，住场头的是我们师著名的老虎连，我们教导队住场中间。这么强大的阵营住在一起，是在剿匪中很少有的事，大家都放心地高枕无忧了。

半夜，土匪专选教导队住地摸进来了，我哨兵正抱着枪睡觉，土匪抓走三男两女，放了几枪就跑了。三支部队在惊恐中乱打一气，打到天明，才发现自己人

在打自己人，互有伤亡，又互相指责，军分区处分了我们队长，说是他的失职。

被抓到土匪窝的两位女同胞，当了压寨夫人，三位男同胞，在土匪营垒中出任要职，一位当政治部主任，另两位是副主任，给他们做宣传，揭露共产党杀人、夺粮。几个月后这几位又被我军俘获，批判了他们的立场，就打发回家了。

师领导看到学生兵集中一起，只能作无谓的牺牲，决定分散放到战斗连队当催粮员。我们班分到 03 团的警卫连，一个班一名，我在二班，姬云在一班。这个连全是老兵，武器优良，班有机枪，班长副班长配冲锋枪，战士手中有日本人的三八大盖。学生兵仍背汉阳造。

刚进战斗连队，又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

土匪对付我们是小股分散游击。匪民难分，你闻枪声追过去，他们把手中枪扔进草丛，等你到跟前，他已拿起锄头锄地，让你没法抓人。西山是土匪的大本营，为打击土匪，我们转移到来苏镇西的一家地主大院，每天外出催粮，都是一个班集体行动。

一天，我们二班进山催粮，刚进一条山沟，两侧山上枪声骤起，头顶上子弹在嗖嗖横飞，我吓得滚进了路边的水沟，环视四周，全班都各自找了个坑坎蹲下来举枪还击。这时，躺在田埂后的班长猛然一声喊：“全班跟我走！”大家跃起，勾着腰向后撤退。我没战争经验，竟从水汪汪的稻田，连滚带爬地跟了过去。他们都在一片坟地里停下来，各自选了个卧位，霎时，机枪，冲锋枪响成一片。

我是最后跑到坟堆的，也伏在一座坟上，懵懵懂懂地打了一枪。正射击的副班长回头看了我一眼，喊道：“姿势低些，向我靠拢。”我爬到他一侧的坟堆上，迷迷糊糊的又放了一枪。副班长又喊开了：“瞄准射击”。我见他把腮帮子紧贴在枪托上，沉住气在用冲锋枪在点射，我这才通过缺口、准星向山上的人连连放枪。

山上的土匪是从三面夹击我们，我跟前被子弹掀起的土块，扑打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我们和土匪相持了个把小时，增援我们的一三班赶来了，强大的火力像炒爆豆，土匪招架不住了，排长起身一挥手：“冲上去！”我们冲上山，土匪们跑了，留下 7 具尸体和 13 名伤员，排长要继续追击，令二班副带我和姬云留下看管俘虏。

俘虏伤势不轻，都躺在草地上呻吟。姬云撕下他们的衣袖裤腿包扎，问土匪些眼前的事情：“你们是那一股棚子？”不答。

“司令是谁？”不答。

“你家住哪里？有多少地？为什么不想缴公粮？”

姬云走到二班副眼前小声地说：“我们能不能放走他们中间的一人，要他回去带人来搬走死人。”

副班长一听瞪大了眼睛：“那怎么可能？要犯错误的”。

“我们应当讲人道主义，况且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土匪，上头要问，我来承担责任。”

二班副望着姬云那张天真的胖脸笑了：“你要是当了团长营长就能办到。你好好干十年，我就听你的发号施令。”

姬云说：“我们总不能不讲点政策吧”。

二班副认真了：“讲政策是上级的事，我们当兵的只有执行，小姬啊，你还是个小兵崽子，嫩着呢。”

大队人马回来了，连背带拖地押走俘获的伤匪。把几具死尸留在那里。

四

武装征粮，组织严密，每个连队都有征粮领导小组，成员有连长，专负责剿匪；指导员，抓思想教育；来自师的组织干事，负责调查民情；团的军务参谋，收集匪情；他们三天两头要向上汇报。地方来的是一位收赋员，专管缴来的公粮过秤入库。组长是团后勤副处长，抗日老兵，我们几个学生兵叫他老总。

国民党在城乡的统治，一直是实行保甲制，政权垮了，我们不再依靠保甲长，仅用保甲户口上门，所欠粮户催粮要款。根据保甲住户的分布，战斗班分片包干。我们班包干的第11保，有57家欠粮户，住户都是山区的单门独院。每天一大早，每人带上一张饼，一壶水就上路，跑了十几户人家天就黑了，天天无功而回，还累得腰酸腿疼。

我们没招了，向处长报告：“地主都躲了，留下老太婆和我们磨牙，家家叫苦，要完成征粮任务，得牛年马月。”

处长没指责，也没指示该干什么，只说：“明天我跟你们一起去。”

第二天，他跟我们进到一户小地主家，在屋前屋后转了一圈，就用手中的一根铁条，捅了捅堂屋的一堵夹墙，说：“打开！”

我们用枪托砸出条缝来，伸手一摸，是谷子，大家七手八脚地从墙里弄出十几挑谷子。

又到一户人家，处长见厢房一排立柜下的地面有异样，要我们掘开，弄出几

袋麦子来。又到一个大地主家，在后院山坡林子里的深基里（停灵的地方），处长让我们撬开石地板，取出了一包细软，还有一支金簪子和一百块银圆。

处长的精明和高超本领，让我佩服不已。晚上，我到他的住屋找他闲聊，处长兴致勃勃，诉说了他的见闻和经历。他说，在战争年代每到新区，我军都得采用非常手段筹粮筹款，军队要生存，要打仗，仁慈不是军人的本分，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党的命令。错了，党会纠正，不会让你我承担责任的。你知道吗？四川确实有粮，国民党的田赋多收了八九年，没见过有人饿死。今年，全川要完成征粮30亿斤，永川是大县，要缴两千万斤，比国民党还征得多。我们要粮，不只是为了入川的60万人民解放军，俘虏起义的国民党50万，和百多万公教旧人员。还为了支援那些出现粮荒的地区。这么大的群体安顿不好，天下真会大乱的，我们今天要粮，无非是死几个人，牺牲小我，顾全大我，不要怕人家骂我们在抢粮，为人民利益就是要抢，这是党给我们的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处长一席话，令我感动。也增强了我对共产党的理解——共产党就是会共产。

处长又说，大别山穷得叮当响，我们还能搞到粮，为什么在天府之国却征不到粮？我看还得用大别山的老办法，掘地三尺搞粮。

山里人，家家有狗，我们每天一进山，狗的吠声就震山响。欠粮户一听见狗叫就打开笼圈，把猪牛羊鸡鸭鹅赶到山林岩边野放。我们班花了半天时间撵山捕捉，抱住了三只鸡牵回一头羊。

傍晚，姬云来叫我，要我去炊事班去看稀罕。我俩来到炊事班的后门前，见阴沟边有一条死狗，墙根下躺着一只瘦骨嶙峋的小猪，我莫名其妙，问姬云：“你让我看什么？”

姬云说：“这是处长今天的杰作。”

“怎么说？”

“处长今天跟三班出去催粮，这就是他从农民家收来的最后的家当。”

我说：“我们可能还不了解处长，他的好多做法是来自上头，就是牵猪宰羊，也要折成粮款。”

“你听他说的。我看是他自己为邀功别出心裁。”

我们正说着，来了几个战士，七手八脚把墙根的那只哼哼的猪拉了过来，炊事班长端来只木盆，战士把猪的头部摁在盆边，班长用手中的一把尖刀使劲地插入猪的胫窝，随着嘶声狂叫，一股血从刀口处喷出，猪四蹄踢腾了几下就没声息了，炊事员提来热水，反反复复地往猪身上浇了一阵，就动手刮毛，卸下猪头，

破肚取出下水，劈成两半拉。我估摸50多斤。接着，这伙人如法炮制，也把死狗收拾了，剥出的狗肉有二十来斤。

忙活了个把小时，领头帮厨的一排副洗了手，走到姬云跟前，说：“打牙祭了，你满意了吧。你们小知识分子，就喜欢没天没地地指责这，指责那，好像就你正确。”

“难道我不该说？这里的猪、狗都是从农民手中抢来的，还有理吗？”

我看要争吵开了，赶紧把姬云拉走。

收赋员很辛苦，每收百十来挑谷子，就让连里派出一个班，武装护送到县粮库。半个月过去了，来苏镇收缴的公粮才150挑，收赋员说，收上来的公粮不到2%。收不上粮，处长很挠头，要各个班抓几个顽抗分子回来由他来对付。

五

没几天工夫，每个班都抓来三五个抗交公粮的，大都是些地主的婆娘或帮忙看守家院的三亲六戚。四五十人都关在厢房。

我们住的地主家，进门是块百十多平米的院坝，连队每天的早晚点名，一日三餐都在这里进行，自抓来抗粮户，这里就成了刑场，行刑由处长做示范，全连列队观看。

施刑对象是二班管辖区一个有百十担租的地主。处长执刑，二班全体出动当助手。班长先端来张条凳，一端顶住院墙，两个战士把那个约六十多岁的地主带来，让他贴墙坐下来，一只腿脚平放在条凳上，一个战士用根棕绳绕了十几圈固定，两战士拿了根竹杠过来，横向地死死抵住地主的胸部，处长脱衣挽袖，伸出双手抓住凳上那只脚往上提，并吩咐身边的战士：“放砖！”战士放了两块，地主痛苦地嗷嗷叫。处长问地主：“好受吗？”对方只是叫唤，没回答。处长又抓起脚跟提起：“再加砖！”战士忙又塞上一块。地主叫声更是惨烈，喘着气说：“饶了我吧，我回去卖田卖产给你们”。

“再加一块！”

地主在嚎叫中昏过去了。处长挥了挥手说：“先停一下，给他浇点水。”

副班长端来一盆水洒在地主头上，没多会，地主缓过劲来，处长俯下身问：“你想不想交？”

“我家实在是没有了啊！”

“你来再添块砖！”处长吩咐在他近前的姬云。姬云不动，愣愣地望着处长。

“你傻了？”处长气得眼都红了。

姬云依然纹丝不动，处长火了：“你给我滚开！”

全场人都愕然地注视着走开的姬云。

处长昂起头，对大家说：“都看见了吧，共产党人就要这样斗地主，不斗我们就翻不了身，打下的江山就不稳固。谁右倾，谁同情地主，就不是个革命者。”

不一会，二班又带来一个40多岁的地主婆，给她的惩治不是坐老虎凳，是让她跪在条凳前，两个战士压住她后背，一个战士反扭住她的左手，班长把她右手掌摁在凳面上，处长用了根炊事班拿来的擀面棍，使劲地来回碾她的手指。

地主婆痛苦不已，拼命地挣扎，呼天唤地，那声音尖利扎心，我连连地打了几个冷战。我注视周围的战士，他们打过仗，见过流血牺牲，眼前他们也闭上眼，有的掉过头，不忍目睹这幅惨景。

地主婆痛晕后回过神来，说“放我回去，我会去借来八挑谷子给你们。”

处长说：“给你五天时间。”

处长转过身来对全连观看的人说：“从现在开始，都照我做的办，粮食就在板凳上。”

放手让大家干，连长担心动刑动过了头，走到队前告诫：“手不软也得留点情，千万别给我整死了人。”

连队散开，各班都找来条凳，找来竹杠，找来绳子，从厢房各自带来抗粮人，学着处长的做法，在受刑人脚跟下一次次的添砖。一时间，小院坝里哭声震天。

我们班由班长主持行刑。我负责压腿，刑惩了三人，叫喊声撕心裂肺，都口头承诺交粮交款。

一天光景，抓来的人几乎人人都过刑一遍。

六

晚餐是在院坝集体开饭，以班为单位，围住菜盆扒拉，我快吃完了，指导员端着碗到我跟前说：“吃罢饭，你、姬云，我们一起到院子外走走，交交心，你是他好朋友，多开导开导。”

我洗了碗，便跟指导员到了院门口，姬云正坐在石阶上等我们。我们沿着田埂，到了对面小山上，那里有几块光亮的石头，就坐了下来，指导员先说开了。

指导员是山西人，1946参军，贫农，他跟我们谈起了他家乡的土改：“地主是压在农民身上的大山，不清算地主，农民得不到翻身。我们村的地主批斗后，

撵出家门，给他安了个窝，让他们自食其力。我家分得五亩地，两间房，还得了些箱柜衣物，叫浮财。”指导员说着，脸上露出喜悦之情。按姬云好争辩的个性，指导员的话会引发他抗争的。但他却很平静地说：“斗地主，侮辱人格，抢走财产，我的看法是不合法的，我认为，应该是减租减息，让地主交出过多的土地。比如，一个地主给他留下二三十亩地出租或自己劳动，和和平平地相处，有什么不好？非要弄得你死我活的，国家还能长治久安吗？”

我没想到，姬云的思考要比我们高出一大头。我同情他的观点，说：“今天我们把人整得太惨了，就没有别的法子要粮？交不出，明年再来不行吗？”

“我们要粮，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光靠一张嘴是不行的，对付地主阶级，就得给点伤筋动骨，知道了共产党的厉害，他们就皈依佛法了。”指导像在上政治课，一本正经。

姬云问：“其他地方也像我们这么蛮干？”

指导员说：“这是邓小平政委的决心，我们完不成任务，就是我们的失职，要追究责任的，谁也不敢怠慢。”

姬云不再言语了，他的头偏向一边，望着下山的落日。我也无话可说，站起身来：“回家吧。”

第二天，挑粮救人的来了一串，还有送来银圆和黄货的。我们班一户地主婆上门来央求处长，请求宽限些天，她去重庆向儿子要钱来折粮。处长问：“你能去要来多少？”

地主婆说：“三十块大洋。”

“够吗？”

“不够再想办法，我还有几户亲戚，他们会救我的。”

处长见她确实山穷水尽，严厉地说：“去吧，下不为例。”

地主婆磕了个头，胆战心惊地走了。

就在我们用刑罚征粮之时，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我们紧急收兵回营整训，准备上朝鲜战场。我们离开后，由区县新建的武装毫不手软地继续在老虎凳上“征粮”。❏

杀俘虏 壮胆气

——攻陷“土围子”之后

刘家驹

1999年，我受命到南京组织编写部队史，访谈数百名当事人，遵照领导的意愿，只拣“伟大、光荣、正确”的口述资料，整理汇编成册。回到北京，我的“不掩恶”史观也回归，打开访谈笔记，原汁原味地整理出一篇血腥的故事。为了不给受访者找麻烦，我用拼音代替他们的姓名。

L（时任某旅政委）：我们这支部队，是1945年11月初在太行山组建的。“八一五”日本投降，毛泽东看到了机遇，要我们“寸权必夺、寸利必得”。国共两军摆开了战场，上党一战，我军歼灭阎老西三万五；察绥之战，吃掉傅作义一万二；在邯郸又打败了马法五、高树勋。仅两个月，就得到了在重庆谈判桌上得不到的胜利。尽管签署了“双十停战协定”，我军依然跃马横枪，开打势在必行，中央军委紧急指令各战区扩军备战，我们纵队应运而生。

S（时任纵队作战参谋）：抗日战争结束，我军前方根据地最大的是晋冀鲁豫，人的资源不缺，组建一个纵队并不难。军区决定从几支老部队抽来三个团（其中有两个还是红军团），集中4个县的独立营，提升一批区武装，补充一千新兵，17天就集合了9000人。刚组建的纵队，地方武装多，战斗力参差不齐。刘邓首长最关心的是如何把“二茬”部队，最快地铸成打老蒋的铁拳。

纵队王司令提出“祭旗”，就是执行刘邓意图，通过打一仗检验来自各个山头人马的实战能力。打仗就是打干部，看干部的组织指挥、协同及应变能力。老部队久经战场，拖不垮、打不烂，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地方武装新兵蛋子多，一听枪响就放羊，只有战场才是他们练胆的课堂，经历几次血光磨砺，增了见识，长了胆量，软蛋也会变铁蛋。

T（时任纵队副政委）：王司令说的“祭旗”，是攻打太行山脚下的萧山镇，这是日本人长期在我们眼皮下经营的土围子，6000户人家，保甲严密，就在我们准备出击的前些日子，太阳旗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土顽头子叫杨四子，此人在

军阀混战时期当过营长，日本人来了封他为冀南保安司令。这支土顽一点不土，过去，日本教官经常来督训，日本人投降，又给了他们丢下一批装备，人人手中都是三八大盖，班用机枪是歪把子。杨四子最炫耀的是他有8门“九二”步兵炮，相当于我们两个纵队的重火器。他的班长以上的骨干全是些亡命之徒，都有多年的战场经历。土顽编制正规，有4000多人，战斗力超过国民党的一个旅。

王司令部署第三旅主攻，第一二旅为二梯队，他没有更多的具体交代，目的是考察干部临战的运筹本领。打土围子就是一场攻坚战，只要破开口子就大功告成。三旅旅长组织干部看了一天地形。萧山镇土围子周长4公里，用黏土合生石灰筑成。基础是半人高的砌石。寨墙高三丈，宽一丈余，墙上四角的碉楼都有有机枪工事，围子外是护城河，河宽两丈，深一丈，蓄满了水，人不能涉。土墙上射界开阔，周边无任何地物遮蔽，攻击部队很难靠近。

S（时任某旅作战参谋）：部队新组建，有的班还搞不清相互的姓名，更不知战斗技能的根底。我们武器差，人手一支汉阳造，才十几发子弹，一个营有一挺重机枪，还是德国人一战时期的马克沁，开了火还得往枪肚子里灌水。旅长让三团打头阵，这个团底子薄，是独立营、区干队和新兵编成的。旅长是红军过来人，打仗从不计人的成本，经历告诉他，战斗越残酷就越磨炼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就是好样的。

W（时任二营营长）：我的营最先投入战斗，二连担任第一次攻击，他们原来就是当地的区干队，土生土长，熟悉地形人情。但是，这帮伙计大都是只抓过汉奸，或到日本人炮楼下放两枪就跑的角色，参与这么摆开架势的大战还是头一回，你看他们的接敌运动，个个弓着腰，半天挪一步，拥着挤着，没个战斗队形，给人家机枪一扫一大堆，前进没半里地，就稀里哗啦腿肚朝前地垮了下来。

我又组织一连上，他们似乎接受了二连攻击的教训，连长出了个馊主意，从老百姓家弄来八张方桌，每张桌面上捆了五床棉被，以为可以挡住敌人的子弹。四个人顶起一张桌子一齐往前冲，神乎乎的竟然冲了好几百米，敌人的小钢炮是直射的，一炮一个准。团长来了，骂了一阵娘，说顶着被子打仗是蠢驴干的事。

我们改变了策略，组织夜间攻击，三连冲到围子前无法过河，我又让他们抱高粱秆去填。敌人在护城河边生起火堆照明，我们上去一个给打趴一个。团长让我们的进攻停下来，部署一三营挖堑壕接敌。

这个工程大，全在夜间作业。两天下来，进度不到 50 米。敌人发现翻起的新土，知道了我们的意图，一边组织射手打，一边用九二步兵炮猛轰。

旅长急得无计可施，请示王司令说，这个本我们赔不起了，请求撤出战斗。

王司令火冒三丈，骂旅长，你连个土老帽都拾掇不了，还有本事去啃国民党的硬骨头，你不打就滚开，让二旅上。

H（时任某团政治副主任）：三旅在前面打开了，我们二旅在后面没有消停，一边观察战场，一边在做投入战斗的准备。三旅伤亡 500 多人，大家心里都在打鼓，团长说，不能再这么蛮干了，他支了新招，掏地道去炸土城墙。办法是一个连干他娘的一天，24 小时轮班作业。

L（某团三连长）：我们连是最先投入挖地道的。地道口开在萧山镇西南有 600 米的一个小村子里，那里有房屋和树丛遮掩，出土隐蔽，挖的洞高五尺，宽三尺，边往前掘还要挖转换洞，给过往的作业人掉转身用。我们团十几个连轮番干活，足足挖了一个月，几个参谋拿来绳子反复丈量距离，确认已经挖到土墙根了才停下来。副团长弄来两口棺材，填满炸药，在他的指挥下，前头用绳子系住往前拽，后面用杠子顶住推，好不容易送到土围子墙底下，等到拂晓时分，团长一声令下，轰然两声巨响，等冲天的浓烟散去，我看到土墙给炸出了一道三四丈宽的大口子，只见伏在护城河边的一营突然跃起，踏着事先绑扎好的浮桥，从缺口冲进了土围子。我带着三连跟进，土顽依托街垒顽抗，我们就边打手榴弹，边拼刺刀，逐户逐垒争夺。这时，天已大明，每一条街上都布满了敌我的尸体，没打死的在呼天喊地。旅长进来了，命令把自己伤员赶快抬走，土顽的尸体全拖到大街示众。我数了一下，打死的土顽有七八百人。

S（时任旅作战参谋）：我们搜查藏匿的土顽，两天就搜出 2000 多，纵队有要求，凡是中队长，大队长以上的官，交给群众批斗后再处决。开会时，一个老大娘拿着把剪刀，走到一个胖子俘虏跟前，用剪刀直往他下身扎。胖子狂叫，扭动着被捆绑的身躯，大娘毫不手软，直扎得他鲜血染满裤裆才罢手。老百姓告诉我，这个胖子是大队长，奸污了她的闺女。

W（时任营副教导员）：纵队又来新指示，班以上骨干都要处决。杀多了怕群众反感，要我们把土顽押到附近的煤窑去收拾，那里的窑井都是竖的，几十米深，把土顽带到井口，先给他腰上插一刺刀，然后用脚一踢蹬，土顽刚叫出声就

栽下了矿井，还省了子弹。那天晚上，我们营杀了300多。

Z（时任某团教导员）：我们开始是先挖坑再捅人，很费事，后来，看到别的连都拉到煤窑去干，我们也找了一处矿井。我们的杀法不一样，把土顽推到井口前，让两个战士分别对准土顽的前胸后背对刺，一挑一落，俘虏喊不出声就落井了。有一个土顽跪下来向我们请求说，他要先给自己老娘磕个头，再让我们动手。我答应了他，他朝着萧山镇方向磕了三个头，战士才把他挑下了井。那天，没有月亮，我们执行的很认真，杀了300多人。

W（时任指导员）：萧山还没开打，教导员来给我们传话，说上头通知，三种人要杀，一是手里有枪的；二是班以上的骨干；三是穿毛衣的（石狮子给有战功的老土顽每人发一件毛衣奖励）。当土顽谁没有枪啊，都该杀。打开土围子后，我们连抓了50多个俘虏，怎么处死呢？大白天当着老百姓下手，不好看，我们决定像别的连一样，把土顽带到窑井跟前去杀。我怕新兵手发软，就让新兵三人干一个。动手前，先让副连长做示范，他在太行二分区刃刺比赛得过奖，出枪姿势好，有力度。他刺土顽时，蹬脚的同时拔出刺刀，动作干净利落。

杀到最后，剩下个小不点，模样有十一二岁，是一个大队长的勤务兵，我想这小子不会有血债，要求连长不杀。连长向营里告了我一状，说我右倾，立场有问题。教导员来了，劝我，还是杀了吧，放出去他会到处讲的，影响不好。再说，你放了他，给别的营抓住也活不了。小家伙由你来处置，别弄得血淋淋的。

正好李副连长端枪过来，小家伙腿在不停地抖动，哭喊着要回家。李副连长摸了摸他的头，然后用手在他脸上一抹，让他闭上眼，说，谁叫你当土匪的，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快活吧。他的刺刀尖没有指向小家伙的心脏部位，只在屁股上点了一下，抬脚一踹就下了井，很长时间才听到一声落地的闷响和传上来的惨叫。

H（时任纵队管理员）：上头命令杀土顽，说是邓政委指示。我们就挨家挨户把男女老少都集合在大街或大院里，要他们脱下外褂查看，凡身上穿毛衣的都拉出带到一边。没穿毛衣的，就让土顽来指认，是不是同伙。那些天，我到处转，看到部队白天黑夜都在不停歇地杀人，干部战士的手上衣襟上都是血污，开饭时，有的把自己的手在身上蹭两下，有的就用带血的手抓住馒头吃开了，我看得腻歪又心惊肉跳。

Z（某团八连新战士）：我是新兵，刚补到连里，枪栓都拉不开，打萧山，

班长头里领着我，顶着“嗤嗤”乱叫的子弹进了土围子。我们连冲杀了几条街，伤亡了一半，我还没有打出一颗子弹，班长、连长都杀红了眼，见人就杀。我被街上的死尸、血污吓蒙了，爬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不敢动弹。第二天，班里分来两个俘虏，说是给我们新兵练胆，班长问我敢不敢扎，我知道要我杀人，吓得不敢吭声。班长把一个土顽脱光了衣服绑在枣树上，然后把上好的刺刀交给我，要我上。我双手已不听使唤，端着枪，闭上眼，枪尖刚顶住土顽的肚皮，再也无力捅了，班长上来持住我双手，一用力，扑哧一声捅了进去，一抽刀，血喷出来洒了我一身，土顽嗷嗷叫开了，我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班长紧催我，快捅第二枪呀，我的手发抖了，还是班长上来把我抱住，连扎了土顽的肚子好几下，直到土顽没气了。接着，拉过来第二个又蹦又叫的土顽，两个老兵死死地把他摁在地上。班长叫我去脱他的裤子和鞋袜，那家伙怎么也不干，班长上来几下就扒得他一丝不挂，叫我压住土顽的头，他用膝盖顶住背，呼唤旁边的两个新兵过来，命令他俩一起下手，班长喊着口令：一二，刺！两个新兵战战兢兢地端起枪，正指向土顽的腰部。我怕明晃晃的刺刀刺着我，我一躲闪手就松开了，土顽趁机跃起拔腿就跑，尽管他双手给捆住，还是连蹦带跳地钻进了草丛。一个老兵放了一枪，班长说，算了，回去后都不准说人跑了。接着，连里又送来了一个俘虏，说是给胆小的新兵补课，班长怕土顽再逃跑，先在他肚子扎了一枪，再让两个新兵捅。我们班终于人人刺刀见红了。

放跑了土顽我一夜没合眼，第二天，班里又分来了几个俘虏，一股虚荣心支配我，为显示我不再是熊包，主动向班长请求让我先来。班长说，我不帮忙，就看你的了。我把一个土顽弄到河边，跪在河沿上，他吓晕了，不喊不叫，像是失去知觉，我更加壮了胆，两枪刺就捅他到河里。那天晚点名，指导员还表扬了我。

杀土顽为什么还要土顽身上一丝不挂呢？老兵说，就是要你看到鲜血从白净的肉上汩汩冒出来，看多了，胆气也大了。

Y（时任某团副团长）：新兵一见到土顽死前那双恐怖的眼睛，自己就先瘫了。我去看处决土顽的现场，给二连还做了示范，我对新兵讲，你不敢杀人，人家就要杀你。我拉来一个土顽，一枪刺就穿过他的脊梁，然后往下一压，空气进入胸腔，血从刀刃的血槽喷出来，我往上一挑，轻松地拔出了枪。新兵看得脸煞白，腿发颤，还是不敢上，我决定改变杀法，不让新兵看到土顽的眼睛，我召开

各连参加的现场会，先让老兵挖出一排坑，把几十个土顽带上来，衣服全给扒光，把他们打晕后，倒埋在土里，光溜的两条腿叉开来，活像辟开的树杈，我让两个老兵拥着一个新兵，端上枪，要他们嘴里喊着杀声冲上去，出枪，刺！每人都连续刺了十多下，血从两条腿上流出来，刺刀红了，地面红了，新战士惨白的脸上全是汗。

M（时任某团参谋长）：我首要任务是抓土顽头子杨四子，没料到这家伙在我们进到土围子之前就带着几个人从地道跑了，二营在他家抓了30多名女子，都是杨四子的家属。有人指认其中有几个是杨四子的小老婆，还有女儿女婿三亲六戚，二营长已杀昏了头，根本不去想什么妇孺无辜，他让几个老兵把女人身上的衣服扒光，倒栽在地里，老兵很兴奋，都奋勇当先，一个不落的全给捅了。尸体不让老百姓看见，当夜就埋了。

C（某团通信参谋）：团长怕有的连干部心慈手软，要机关干部下连监督。我到七连去看俘虏的处决，他们抓来的土顽，先是关在老乡的大院里等到晚上再杀。我到一家大院时，正批斗杨四子的老婆，他是从一户人家搜出来的，主持会的是七连的副指导员，他准备会后当场处死。我不同意，要他避开群众。开完会，副连长不由分说，就带领几个老兵，把这个女人拉到地里，一扒光衣服，几把刺刀一起往她下身捅，顿时，白净的躯体满是血污。老百姓不敢近前观看，站得远远的皱着眉，摇着头。

Z（时任某团特务连连长）：在处决土顽时，我发现有个13岁的孩子。他不哭不叫，好像什么都不懂，我问他是在干什么的？他说，是吹号的。我把连里的号兵小何叫来，要小何的号给他吹，他吹了几个调，音色挺好，比小何强多了。我有意留下他，又怕营里知道，我让小何把他悄悄地带回连队，给换了身军装，他就这样躲过了一劫。后来，当了班长、排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给美国飞机炸死了。

D（时任某团政委）：我们团是后进土围子的，清查时抓了土顽一百多人。上级不让白天杀。晚上，我们杀的方式不用刺刀，为了不让俘虏喊叫，就先用木棒把他们一个个打昏，给活埋了。我是从红军时期过来的，战场的经历和见闻不少。当年，国民党抓住红军，不少人遭到剥皮抽筋，日本人俘虏八路，当活靶子练刺。我们对部队进行这种活的政治教育，就是要战士仇恨阶级敌人。

慈不掌兵，这是古训，一个勇于拼杀的指挥员，他带出的兵，大都有饥餐胡虏肉，渴饮匈奴血的气质。我不反对战场上讲人性，但不能脱离我国阶级斗争的现实，老百姓对这帮人有切齿的痛恨，战场报复越残酷越具有无产阶级的本性。

Y（时任某团教导员）：我们营的每一个班都分了十几个土顽，我把党员、老兵召集一起动员，要求党员带头，下手不软，给新兵做出榜样，谁不愿杀就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不准入党。今晚开第一刀，我先上。

白天，我们先挖好几个准备埋人的大坑，晚上，通信员提着马灯，我们把土顽带到土坑前，我先挑出一个土顽，让他站在坑沿，此人人高马大，是杨四子的教导队长，他知道自己大限已到，不卑不亢，身体也一点不软。我提上三八大盖，一刺刀捅过去，血呲地从他光秃秃的胸口喷射过来，他硬挺挺地倒在坑边。我去拉来第二个，正准备出枪，他的嘴没堵好，嚎叫开了，我身边的通信员眼快手疾，上去一枪就把他挑倒了。

后面正临刑的土顽们吓坏了，死命地挣扎，挣脱的就向四处跑，老兵们追上去就捅，半个时辰就杀的一个不落，营长还特别赞赏说，要他们平时练刺杀，怎么也拿不出这股子劲来。第二天，土顽的尸体不见了，被老乡拖走了。

我住的房东家有个小孩，他姐夫是土顽，小孩天天煮红薯给我们吃，要我们不杀他姐夫。

G（时任某连司务长）：打进土围子后，营长要我们杀他个鸡犬不留。后来，王司令来了，他站在土墙碉楼上一看，到处都在杀人，萧山镇成血河镇了。他心软了，才下令不让杀了。他要我们铲去地上的血污，赶快把尸体都埋掉。埋在地里的土顽尸体，都给野狗从坑里拖出来啃咬，满地留下一片白花花的人骨。好些天，我都睡不着觉，老做噩梦。

Z（时任某团卫生队医助）：那时缺医少药。一天，队长叫我去，他带我到一家大院，院里摆了五六具尸体，都是胖胖的。队长指着一具尸体说，他是萧山镇的财主，肚皮里油脂多，你把它取出来。我用小刀剖开腹腔，挖出了一大块，接着，又在其他几具死尸中挖取，足足割下来大半桶。

那几天，我就带着卫生员从尸体腹中剥离下来好几桶人油，熬制成了油膏。后来，我们在大别山打开了一座县城，抓住了伪县长。我先让几个战士给他几刺刀，我才上去撕开衣服，切开肚子取人脂。

我们在中原战场转战，我的药箱里只有一些普通的药物，连柴胡这种普通针剂还是太行山唯一的一家药厂生产的，阿司匹林都没有，我们利用人脂，解决了部队战伤很多困难。邓政委说过，救活一个红军战士，等于增加了一个连的战斗。人道主义只能为阶级斗争服务。

Y（时任某团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初期，蒋介石把我们困在太行山区，两次出击陇海线，都被打了回来。根据地的72万军民生存都成了大问题，中央决定我们千里跃进大别山找活路。进入大别山，第一个动作就是打土豪，目的不是为穷人分田分地，而是军队初来乍到，要吃要穿求生存。其实，大别山真正的土豪没几个，中农居多，凡有猪的，有牛的，不管成分如何？都给弄来保住我们的肚子。老百姓反感，组织起来刀枪相向，我们下到地方的工作人员被杀的不少。

大别山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十多年后回来，竟成了老百姓的敌人。老百姓口传：一怕中央军，二怕还乡团，三怕共产党。尽管这一左的政策只有三个月，老百姓心目中的红军形象已大大丧失，直到淮海战役胜利，老百姓对解放军才开始笑脸相迎。

M（旅作战科长）：我们在大别山抓了100多地主和还乡团，带着走了几天，实在累赘，就决定干掉，我把他们带到一座山上，找一处悬崖，我让战士用枪刺挑，挑一个往沟里踢蹬一个。下面全是黑森森的树丛，不须去掩埋，我们是夜间杀的，用手电照一下，一刺刀就完事。

那一年，我们和国民党在大山里兜圈子，条件恶劣，天天行军，带着的战俘就成了包袱，凡负伤的，还要扶着架着，更是累赘，我决定一律处决。人道不人道，只有天知道。

B（时任某团宣传股长）：我们刚进大别山，要生存，什么人的利益都可以去侵占。到一个地方，把老百姓抢个精光，吃个精光，人家就跑到山上去骂我们，说跟日本鬼子进大别山一个样。你骂你的，我干我的，看到哪家房子好，就进去搜刮，有米就煮，有猪就杀。我们团长穿了件日本军大衣走在大街上，一个老百姓以为他是中央军的长官，跑来向他报告，老总，我们刚抓到一个共产党。团长一听，抡起马刀就把这个老乡砍下半边脑壳。

L（时任某团后勤管理员）：我到一家布店，老板见我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我向他借布，老板问要几丈？我说，通通借，全国解放后，政府会来还给你的。

左说右说老板就是不行，团长来了，见我光动嘴不动手，火了，怎么还不动手？老板娘见我们搬走她全部家当，跪下来抱住团长的腿哭嚎，老总啊，留下点吧，我们要活命呀！团长说，我们的命更要活。一脚踢开了她，一挥手，统统抱走！

L（时任某旅组织科长）：当时，我们在大别山对待乡绅、地主也讲政策，通常用了四种手段，就是白、黄、黑、红。比如搞粮食。见普通财主家库粮有十来石，就掏白——三四块大洋。财主嫌银子少，不干。马上又掏出黄——一只三四钱重的镏子，财主也不干。然后拿出一块黑——烟土，斤把重，既不是川土也不是云土，是当时打家劫舍来的本地种的老土。更是不值钱。如若财主还坚持不要，就来红的，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杀这帮人不需要请示，谁都可以动手。

W（时任团后勤处长）：我们还有一招，就是把地主的小老婆抓来，要地主拿粮食来换。地主要是要赖、顽抗，就当这个地主的面，把他小老婆宰了，然后再把刀架在他脖子上。这个办法很奏效，地主都能乖乖地交出藏粮来。有些人是不是地主，我们也弄不清，反正不交粮的就一视同仁。当时，我们远离根据地，没有任何后方支援，为了部队生存，不得不干些日本人干的事。

×（时任某旅旅长）：我们打开了长江边上的一个县城，俘获了敌人两个保安团 3000 多人。对土顽，我从不发善心，也不怕杀错人，凡要杀的，都是由我验明正身，那时无法搞什么政审，由我来看他们手上是不是有茧，没茧的，绝不是劳动者，宁杀勿放。

我们用了十几条船，把俘虏分批地拉到城北的一个大湖的当中，用木棒打俘虏的头，敲一棒就往水里一推。那几天处决的大约近三千人。保安团的家属都远远地站在山头上大喊大叫：“不能杀啊，他们为了有口饭吃才当保安团的。”阶级斗争是我们的尚方宝剑，不杀就会有人指责我的立场有问题。后来，国民党来了，从湖里捞出尸体，拍了照，他们在武汉的各大报纸上大肆宣传，硬说我们杀了 6000 多人。

后记：初稿落笔，虽系受访人的实话实说，仍忧惧文字风云的不测，敬请几位朋友斟酌指正。一位熟知军史的长者，毫不留情地指责我离经叛道：“为什么要这样写？”“你这是反党乱军！”另一位是 70 后的军旅作家，疑惑“我军哪会有这种事？”“难以置信。”如若将此文见诸网上，很可能招致“官二代”怒

不可遏的抨击。

我军滥杀之事，是不会被记入史册的，仅在几部回忆录中略有披露：1930年代初，两次清除莫须有的“AB团”，毛泽东率先杀掉红四军干部战士一千八；鄂豫皖的张国焘，整肃红四方面军干部两千五百多；夏曦在湘鄂西杀的只剩下六个共产党人（三个苏区就杀掉11万人）。红军仓皇长征，行动路线保密，邓发下令，把数以百计走不动的伤员一律处决。残杀自己的人手下都不留情，何况杀的土顽是日伪蒋帮多重的敌对身份。

我的访谈者对这段史实的叙述，都无顾无忌甚至是理直气壮的，认为军队就是开打仗铺的，杀人是阶级斗争的需要，土顽罪有应得。在战争年代，当事人都有卓越的功绩。建国后，有的已是大军区、军兵种的司令政委，有的转到地方当上了国防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其中有三位政治局委员，三位中央委员），一般的也位居军师两级的中高层，他们都是我尊敬的前辈，我既不能回避不光彩的历史，又不能把已去天国的魂灵拉回来接受当今文明社会的“洗礼”，只能隐其姓、埋其名地就事说事。我要告诉公众的是，这场反人类的屠杀是党的意志，是党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留下的遗迹。

20世纪50年代初，败落到台湾的国民党，将捕获的中共地下党一千余人杀害。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执政后，对此做出了人性的反省。中共也亟须对历史反思，但愿腥风不再吹起八一军旗，我军的建功立业，不再是血洗阶级仇、民族恨。■

【人物】

华国锋为什么选择辞职¹

——邓小平擅权的战略布局

施滨海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华国锋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所形成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或说是他与邓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从“全会公报”里那段由华本人

¹ 本文选自施滨海先生的遗稿《历史转折中的华国锋（1973～1981）》。施先生于2018年不幸辞世后，其生前友好吴伟、单少杰等国史专家将其遗稿整理成书。这里发表的是由单少杰先生整理的该书的第六章的第一部分。施滨海（1962～2018），上海人，著名新闻记者，时政评论家。198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曾先后担任《法学》杂志编辑、《中国市场经济报》记者、《中国经济时报》编委、香港《成报》董事，曾与友人合著《政治中国》一书。

提议要写的关于“少宣传个人”的话中，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华刚被确立的“英明领袖”地位已发生了动摇。

在公开场合，邓小平与华国锋都仍然保持相互尊重，都避免显露任何不和；但在高层内，特别是在相继召开的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已在紧锣密鼓地不断削弱华国锋的权力基础。

一、排斥华、叶，完成军权转移

1979年11月11日，叶剑英从北京飞抵广州。广东是叶剑英的家乡，也是叶剑英政治势力的大本营。叶剑英此次回广州，为的是要“一边休息一边调查研究”。¹

就在叶剑英飞抵广州的同一天，邓小平乘专列也抵达广州。邓小平11月8日从北京启程，一路上分别找河北、河南、湖北等省的军政要员谈话。

邓小平主要谈的是有关12月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的筹备问题。其会议主题报告题目早已定了下来，叫作《抓纲治军，准备打仗》。乍一听起来，这个题目似乎与华国锋的“抓纲治国”说法紧密配合，但事实恰恰相反。

自11月8日从北京启程后，邓小平就在专列上反复研究这个“纲”，并与华楠等人谈叶剑英将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所做主题报告的起草问题。²

华楠回忆：他（邓小平）说：这个文件以什么为纲？揭批林彪、“四人帮”可以叫纲，但这是暂时的，我们还有长远的考虑。阶级斗争为纲怎么样？罗瑞卿同志很敏锐，他说，“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这是个打人的棍子。”³邓小平想退回到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立场上，但被罗瑞卿所阻止。本来，毛的这一立场已被华国锋通过反“四人帮”而化解掉了。

可见这时，邓小平心里还没有一个明确主张。在8月23日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曾谈道：“某一个时期总有某一个时期的纲，某一个部门总有某一个部门的纲。就当前来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是我们的纲，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但总要有一个时间限制。对于军队，整顿至少是三五年的纲；准备打仗是

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第1133—113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36页。

³华楠：《征途感录》第116页，北京，长征出版社，2007。

打仗以前的纲。”¹这仅是对军队而言的。

在“纲”的转移上，即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华国锋与邓小平并无分歧。

在广州期间，叶剑英先后同在广州的邓小平、许世友、韦国清、苏振华、罗瑞卿、姚依林、梁必业等谈话，也多次听取从北京到达广州的军委会议文件起草组华楠等人的汇报，并就报告起草稿提出了修改意见。²

不过，后来有人著文称这些“谈话”是“避开华国锋的广州密谋”，认为邓小平在广州成功说服了包括叶在内的其他人接受了他与华国锋截然不同的“纲”，并进而得出有关“华国锋丧失了以叶剑英为首的军方鼎力支持”的结论。

这一说法缺乏足够依据。如果说邓小平要在广州商谈起草报告是为了排除华国锋的影响，不是没有可能。这份报告也确实“没有像当时宣传的那样，过分突出华国锋同志，在文件中提到他的次数也少”。³当然这与邓有关。可问题是刚复出三个月的邓小平竟毫无顾忌地跑到广州去“密谋”，似与他一向行事风格不符。

何况他还要试图说服叶转而支持自己。邓未必有把握在短短几个月里就能完成这种全局性的权力调整。更何况这次由北京到广州的军中高层人物还包括苏振华，而苏是“紧跟”华的。邓对此是心中有数，否则，也就不会在一年后发生邓联合罗瑞卿、萧劲光等军中大佬无情打击苏振华的事。其实，在邓看来，自十一大后自己就开始逐步接受叶剑英让渡的军权，并且要对付在军中并无根基的华国锋，实属易如反掌的事。

在此前8月25日，叶剑英听取秘书的汇报工作。当听到秘书汇报“邓副主席在军委座谈会上说，军委日常工作由他辅助叶帅”一事后，叶批示道：上报军委批办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秘书随即打电话给军委办公厅负责人，传达了这一指示。⁴叶剑英在自己年龄超过80岁且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做出这一举动，已经不是和邓小平分权，而是在向邓小平让权了。这种高层权力转移过程从十一大结束马上就开始了。

¹ 同上，第115页。

² 《叶剑英年谱》（下），第1134页。

³ 华楠口述，傅颐整理：《1977年中央军委全体会议纪实》，载张树军主编：《历史转折：中国1977—1987》第9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⁴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第1130页。

8月3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文件送审程序问题的请示上批示：“建议以后专送叶副主席批送华主席批准，如叶副主席不在京时，可送我批”。对于叶剑英留下的权力真空，邓小平非常主动地迎上去予以填补。

文件送审程序是权力分配问题。送给叶剑英审阅的主要还是军队方面的权力转移和分配问题。

邓小平擅权，叶剑英十分清楚。粉碎“四人帮”没有多久，他在与熊向晖的谈话中就有所提及，称“邓这个人擅权”。¹叶向邓让权，叶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第一，叶看好华，华其时只有55岁，他要辅助华，使华能够成为这个党名副其实的接班人；第二，叶希望党内老同志，包括邓小平，能够辅助华；第三，叶自认为邓会赞成自己的意见，有把握联合邓，并和其他老同志能够取得辅助华国锋的共识。

若干年后，叶选基曾回忆说：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下午3点钟，我的老丈人吕正操就议论，要不要把这个消息通报一下邓家。我就让吕彤岩找贺平，电话打到贺彪在和平里的住处。贺平得到消息，飞车回到宽街，把粉碎“四人帮”的事情跟邓小平讲了。在讲到华国锋时，邓小平还引用了有关周勃“厚重少文”的历史典故。然后，他说了很经典的两句话：第一句，“华这个人好，选对了”；第二句，“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是贺平后来告诉我们的。完了以后，我就在二号楼当面跟叶帅讲了这个情况。当我说到小平说他可以安度晚年时，他老人家哈哈大笑。这哈哈大笑是什么意思啊？我理解，他觉得邓把自己的前途想得太悲观了。²

叶剑英一开始就对邓抱有这个看法，所以，他才最早提出要让邓出来工作，他认为让邓出来工作可有利于同其他老同志作为一个整体来辅助华国锋。向邓让权，是叶既能满足邓的“擅权”又能联合邓来辅助华的策略考虑。只是叶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了，最后事与愿违。

现在，整人事抓军队、准备打仗，成为邓小平复出后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布局。

在1978年底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萧劲光提出说“苏振华背着海军党委邀请华国锋到旅顺阅兵”“很不正常”。苏振华听秘书汇报后，随即要求承办此事

¹ 熊蕾与笔者谈话（2016年2月14日）。

² 叶选基与笔者谈话（2011年8月27日）。

的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将事情经过报告军委。杨国宇便写出相关证明材料，其全文照录如下：

苏政委：关于4.12工程问题情况如下：

1978年4月12日晚，正看电影，约20:00，苏振华同志通知我和杜义德、刘道生、卢仁灿四同志到他办公室研究一件事。我们一齐到后，苏说话大意是：我向华主席汇报时，华主席说，我在访朝回国后到大连看看海军。估计时间是在5月10日就要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喜事，就是时间太仓促，我们立即准备，一定要搞好这次视察。这件事请杨国宇同志到旅顺亲自布置，并事先约好傅继泽在旅顺等，要绝对保密，不要在电话上讲内容。在未去布置前，你明天先将此事亲自向肖司令报告一下，看他有什么指示？

4月13日8:30我到肖司令家向他汇报，肖即指示，内容大意：华主席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海军出了这件事（指160舰沉没），华主席来鼓励，这与毛泽东（指示）团结起来，焕发精神，把海军搞好是一致的。毛主席没有检阅海军，我心至今不安。周总理检阅了。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傅继泽去我同意。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码头也要搞好，旅顺如何搞好？要好好研究一下。

徐副主席何时到青岛，我到青岛等他。何况华主席。（我问海军是否自己拍部电影）要照相，我们要照一套。

你给梅副司令打个电话。你去布置一下，马上就回来，家里有事。这次旅顺开会我参加，你也参加，你汇报，看地形，我自始至终陪徐副主席。作战部要准备个材料。

1978年4月14日14:50，我由良乡飞抵旅顺布置此事。

4月15日，我同傅继泽同志研究方案，按肖、苏的指示，安排得排场一点，故用78条舰艇，轰炸机12架，歼击机24架，陆上检阅，海上阅兵，后进行战术演习。以上向苏汇报。苏指示：决定就在旅顺，比较安全保密。当时我问苏，是否先向总参报告一下，可能徐帅、杨勇、王尚荣副总长知道后，肯定都会参加。苏当即指示，你明天回京亲自将此事报告邓副主席一下。我说：我不好报告，最

好总参报告。苏即问罗（瑞卿）秘书长是否到了徐州？我即向北京问卢，卢答不用打听了，我上午还同罗打了电话，证明罗还在北京。苏即令我回京向罗汇报。16日我到大连海校布置完后，于4月17日上午回京。当即约定下午4点接见。

4月17日16点—16点15分，我在301医院五楼将我们如何布置迎接华主席视察海军的计划向罗秘书长汇报。罗指示三条：

1. 保证安全，个别舰艇、个别项目无把握的不搞。
2. 国际国内有什么影响？这（么）大兵力光演习一下不行，我还是讲一定要有把握。

3. 4月22日动好。（我汇报时要求马上行动，怕时间来不及）因我21日也许回来。由我告诉杨勇、王尚荣同志，他俩都在徐州。（因我讲用兵要报告总参）19日我出去一下听汇报。我21日回来，杨勇同志因有病我劝他早日回来，他一直不回，这次也可能同我一道回来，部队调动以前由我报告邓副主席。并同我约定打电话的暗号说：“如果我21日不回来，你主动给我打电话说，‘17日那个事情行不行’，我说‘行’就动，‘不行’以后再说”。虽然罗一再讲保密，我因要急于预演，4月21日曾派陈德鸿副部长向总参李力副部长汇报，总参作战部同志赞同我们意见说：东海舰队053H三艘可原地集中训练，待命行动，北海舰队也同意我们意见，按正常训练计划，在本海区进行训练待命。从此以后，我们未进行大的演习。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

其中李力副部长，曾打电话告诉陈德鸿同志说：“你们那个事情，我们于21日15时上报中央军委了。”

我知道的就是这些。

敬礼！杨国宇

1978.12.30.8:30¹

杨国宇的证明材料当即送主持座谈会的军委徐向前副主席。徐看后批示：可以印发会议简报。

不过，萧劲光在其回忆录中做出完全不同的记述和评价。在萧看来：邓小平复出后，特别是就1978年湛江160舰出现重大事故问题，对海军工作做了一些

¹ 杨肇林、丑运洲、乔崖：《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第431—434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1。

批评。苏振华同志对此批评心怀不满，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华对苏表示支持。他们还单独商定检阅海军事项，并于1978年4月擅自着手调集海军大量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准备华国锋同志检阅。萧据此认为，“实际上是对批评做出了一种姿态，动机是不好的。”他还讲到，“苏振华同志是海军政治委员，搞这样大的军事行动，事先不与我这个司令员商量，也不向总参和军委报告，是很不正常的，政治上是错误的。华国锋同志虽是军委主席，但批准这样大的军事行动，不经军委集体讨论，不经过具体业务部门，也是很不正常的。”他又说道：“当我得知这一情况以后，立即指示有关同志去军委、总参报告，我也马上直接打电话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以后，经军委领导同志研究，认为海军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旅顺搞演习、检阅不妥，制止了这项错误行动”。¹

在此次军委座谈会上，萧劲光对苏振华做出了较为系统的批评，“王震也提出了分量很重的批评”。²当然，对于苏的批评，远不止于萧、王的意见。

邓小平就军委座谈会发表讲话：借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风，会议开得比较热闹，简报看了部分，听了些意见，不能说我们的会议开得很成功。都是老家伙，敢讲，但不一定反映准确，有些炮放得好，准不准就值得研究。有一部分是反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的精神，有一部分主观性比较大。越老官越大，就越有放炮的资本。如说老师，我也算老师，我绝不相信我每句话，办每件事都准确，对事、对人都如此。我们提的意见，要客观地历史地分析。³

邓小平讲话后，军委座谈会就结束了。杨国宇的证明材料有没有印发会议简报，苏振华的秘书回忆说“没有看见，而苏振华很快也住进了301医院。”⁴

1979年2月7日下午6时42分，苏振华突发心肌梗死，猝然去世。当晚，华国锋等党政军要员赶至医院向苏的夫人陆迪伦表示关切和慰问，其中华还特别嘱咐说：叶帅他身体不太好，已派秘书王守江来了，劝他不要再来了，刺激太大。

继陈锡联失势后，作为军中最重要的支持者苏振华突然去世，华国锋在军中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了。可以说，到1979年3月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邓小平不仅成为这场战争的受益者，而且基本完成了军权转移的过程。

事隔20年后，即1998年12月7日，陆迪伦去看望华国锋，谈及当年旅顺

¹ 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第378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

² 同上。

³ 《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第431页。

⁴ 丑运洲：《重新工作后的苏振华》（未刊稿）。

阅兵事。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我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队情况，以利以后工作。因此，我先在杨村看了空军飞行部队的汇报表演，当时军委领导同志差不多都去了。所以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没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拟看望海军部队的打算。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有去成。（现在有人说，海军发生了160舰爆炸事故，苏振华到我这里来告状，根本没那回事。再说，我是军委主席，要去看海军部队，也不存在背着军委的问题。有人利用海军内部矛盾，打击苏振华，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海军情况错综复杂，一时难以澄清。但历史终究是历史，谎言总是不能持久的。）¹

二、削剪羽翼，步步紧逼

如同1978年9月间去东北“到处点火”一样，1979年的7月，邓小平乘专列离开北京，开始视察安徽、上海、山东、天津等地。

在安徽，邓要登黄山。他对万里说：“我下了决心，要步行上去。”²他拒坐为他准备的滑竿。

7月15日下午，邓回到黄山观瀑楼，对在此等候的万里等人说：黄山这一课，证明我完全合格。³显然，邓这是在向党内外释放自己身体仍很健康这一颇具政治性的信号。这一年，邓小平75岁。

7月21日上午，邓在上海与彭冲、严佑民、王一平、钟民、赵行志、夏征农等谈话：“大问题是接班问题，任何地方、任何部门都有这个问题。现在就要有意识地选一些比较年轻的人，这是党的战略任务、根本任务。”他认为，“如果说，三中全会解决了思想路线问题，这次就是解决组织路线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一部分干部中，一种是崇拜西方世界，反对四个坚持；一种是利用毛主席的旗帜，坚持‘两个凡是’。这个问题是大量的，不搞清楚，是非就搞不清楚。

¹ 《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第434—435页；括弧内的话引自丑运洲《华国锋谈他所知道的苏振华》，《湘潮》，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2012年第6期。

²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34—535页。

³ 同上，第535页。

思想路线不解决，政治路线是搞不清楚的，必然是摇摇晃晃的。”¹

邓小平并不满足于思想路线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在7月26日抵达青岛后，对前来迎接的白如冰、赵林、秦和珍、李子超、高克亭、刘众前等强调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基本建设，越看越重要，越看意义越大。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说拥护政治路线是假的。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只靠引用几句话，不可能有现在的路线政策，经济不可能搞上去。”他认为，“从全党来说，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是确立了，当然还没有完全解决，还要做大量工作。”他还表示，“现在要明确提出解决组织路线问题，而组织路线最根本的是选择培养接班人。这是根本的问题、百年大计的问题、对党负责的最大问题、组织路线第一位的问题。”²

7月29日上午，邓接见在青岛出席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他在讲话中指出：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是逐步接受了的。他提醒说，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以，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确立以后，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问题，其中最大的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³

8月9日上午，邓小平在天津听取陈伟达的汇报后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

¹ 同上，第537页。

² 同上，第539页。

³ 同上，第540—541页。

唯一标准这一问题不是我提出来的。关于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是在《光明日报》登的，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越争论越大，引起了我的兴趣。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意义太大了。他紧接着提醒在场的人：“不要太天真了，认为三中全会、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以后，天下太平了，没那回事。要注意一下思潮。”¹

可见，邓小平在为“倒华”制造舆论。他认为，“三中全会以后，全会精神没有很好地贯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没有很好讨论。”²而华国锋是党中央主席，所谓“没有很好讨论”，也就意味着受到了华的“压制”。邓的意思不可谓不明确。

8月10日，邓小平结束了为时一个月的有关接班人的“舆论造势”，于当日下午乘专列回到北京。

在掏空华国锋在“政”的方面的权力上，陈云作为政治老手，其政治技巧丝毫不逊于邓小平。

本来，国民经济在这时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业产业在连续遭到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1978年仍然取得好收成，粮食总产量突破6000亿斤，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工业总产值1977年比1976年增长14.3%，1978年又比1977年增长13.5%，增长速度也比较快。由于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财政收入1977年比1976年增长12.6%，1978年又比1977年增长28.2%，做到收支平衡且略有结余。通过重点调整工资，特别是工作多年而工资偏低的职工的工资，从1977年10月1日起，有60%的职工都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收入，使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改善的人民生活稍稍有所改善。这种经济状况，是过去10多年没有过的。

但在陈云看来，事情还有另外一面：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我国的国民经济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间，对这种状况却缺少分析，急于大干快上，要求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经济工作中的急躁冒进使原已存在的问题不但没有缓解，有的还有所加剧。与此同时，他又针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中物资留有缺口的计划，提出：有物资缺口的计划，不是真正可靠的计划；不要留缺口，宁可降低指标，宁可减建一些项目。

1979年3月上旬，陈云借机提出在国务院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问题，并多

¹ 同上，第544页。

² 同上，第545页。

次同李先念、姚依林等商谈。3月14日，陈云和李先念两人联合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他们首先提出：“我们建议，在国务院下设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订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¹

信中提出财政经济委员会组成的12人名单：陈云、李先念、姚依林、余秋里、王震、谷牧、薄一波、王任重、陈国栋、康世恩、张劲夫、金明；其间以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据《陈云传》披露：建议陈云当主任的人是“先念、小平”。²

3月17日，华国锋将此信批给中央副秘书长姚依林，“印发政治局同志”。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召开会议，讨论经过修改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问题。

在3月21日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强调坚持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之后，他还谈到关于成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问题，并提出“我当主任是有问题的。”为此，他还提出两条理由：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我要有自知之明。³陈云的这番以退为进的表白，可谓滴水不漏，无懈可击。

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定了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决定在两年经济恢复的基础上，集中三年时间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会议还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邓小平明确表态：“由陈云、李先念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⁴

3月27日，中共中央通知，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工作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为主任，李先念为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姚依林是陈云在50年代领导经济工作时的重要助手。不久之后，姚又成为兼任国家计委主任的国务院副总理。

尽管这一机构要到7月1日经五届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后正式设立，但事实上华国锋在国务院的实际权力已被明显削弱。

¹ 金冲及、陈群主编：《陈云传》（下），第155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² 同上。

³ 同上，第1560页。

⁴ 《邓小平文选》（2卷），第1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事调整还是“只增不减”。9月25日，十一届四中全会增补王鹤寿、刘澜波、安子文、李昌、杨尚昆、周扬、陆定一、洪学智、彭真、蒋南翔和薄一波等12人为中央委员，还选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赵紫阳和中央委员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真正具有全局性的人事大变动，发生在1980年2月23日至29日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既用了“加法”，也用了“减法”。全会批准汪东兴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还批准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等人辞去他们各自所担负的领导职务。全会还增选两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胡耀邦和赵紫阳。

就在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酝酿相关人选时，华国锋提议由彭真为总书记的人选，但遭到邓小平等人的反对。¹结果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万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穷、余秋里、杨得志、胡乔木、胡耀邦、姚依林、彭冲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开会。就人事安排和设立书记处问题，邓小平谈道：大家对增补政治局常委没有不同意见。大家提彭真同志，我是拥护的。但是，我总的倾向是，包括我在内，慢慢脱钩，以后逐步增加比较年轻的、身体好、年轻力壮的人。这是一个总的决策。我不是说彭真同志不合格，但是，我们确实岁数大了。要说资格、能力、水平，选彭真同志我是百分之百举手，但是考虑年龄，我还是认为不进常委，不进书记处为好。

2

其实，彭真只比邓小平大一岁多。到了1982年9月邓进入十二届政治局常委时已满78岁，而彭在1980年2月离78岁还差半岁多。

回到4个月前，中共中央于1979年10月3日至10日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也就在这次座谈会上，陈云对中共中央组织机构提出一项重要建议：鉴于中央主要领导人多已年老体弱，主张设立中央书记处。他说：

我有个具体的建议，就是成立书记处，调两个比较接触实际工作的同志上来，把财经工作好好搞一下。这是我们国家的大计。靠我是没有饭吃的。我去年12月24日当常委，搞了15天，天天打圈看文件。我跟小平同志说，不行了，顶不

¹ 田西如接受笔者访谈（2016年11月18日）。田西如原为中共山西省委党史办主任，参加《彭真年谱》、《彭真传》的编写，并任《彭真年谱》编写组第一组执行主编。

² 《彭真年谱》（第5卷），第5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

住了。现在，如果成立新的书记处，比从前的书记处工作多就是了。如果组织上不采取这样的步骤，我们的工作就搞不动。华国锋同志太忙了，叶帅年纪大了，小平同志虽然身体好，究竟是70岁了，不能持久。我这是为了党的利益。¹

这一次，陈云在五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次谈了他对成立书记处的意见：

成立中央书记处，这是党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个事情非常紧迫，非常必要。现在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所以，有它的紧迫性，有它的必要性。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²

24日，叶剑英在全会上做重要发言。叶的考虑与陈云的讲话有所不同，他更担心党内出现新的一言堂、家长制。他说：“我们老同志都想为党多干些时间，多做工作，但是年纪不饶人，自然规律不可抗拒，革命事业总有一个交班和接班的问题。”成立“中央书记处，我考虑就是准备接中央的班的。”“中央书记处是培养锻炼党的高级干部的场所。”他还强调：“书记处是党中央的书记处，不是中央政治局的书记处，也不是中央常委的书记处。书记处处于第一线，中央常委、政治局处于第二线。”他希望书记处的同志“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共产党不同于其他政党，从来就是依靠集体的智慧，个人不过是集体的一员，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任何时候，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不能个人说了算。要看到，像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大党，即使是天才，如果突出个人，独断专行，就一定要犯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在这方面，我们党是有惨痛教训的。”³

此后，叶剑英还多次强调，要防止个人独断专行，提倡集体领导。在十二大召开前的1982年5月26日晚，他对新上任的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副主任杨

¹ 《陈云传》（下），第1587页。

² 同上，第1589页。

³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第481页。

德中有过一番语重心长的寄语。

叶剑英说，你们年轻人上来工作，很好。年轻人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接受新事物快，老年人经验丰富，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整个人类发展观点上来说，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一个人的头脑是有限的。一个人，无论他的水平有多高，总有他的局限性。因此，任何一个人都要善于学习别人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智慧，充实自己的不足，弥补自己考虑问题不周的地方，打破自己头脑的局限性。一个领导干部，就要坚持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中群众的智慧，这样，才能生气勃勃地把工作搞好。

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是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保证。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主席领导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凡是坚持得好的时候，我们党就兴旺发达；凡是坚持得不好的时候，党就犯错误。老人家晚年违背了自己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民主集中原则，一个人说了算，孤陋寡闻。那时连周总理见他都很困难，我们这些人就更困难了。民主集中制完全被破坏了，以致在他的晚年犯了严重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了十年内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血的代价啊，要认真总结这个教训。

你能知道自己不够就好。要了解自己，了解自己不容易，了解别人更不容易。要做到既了解自己，又了解别人，在干部问题上要“知人善任”。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有一段话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总结了两汉四百年兴衰历史，归结为能否做到“知人善任”。我们要以历史为鉴，一定要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班子配备好了，我们老年人就放心了。

年轻人上来工作，说明我们党是兴旺的，革命事业是兴旺的。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自有后来人。但是后来人靠我们培养，选拔，这是一项头等的战略任务。你们一定要把一班人团结好，把队伍带好，把党的优良传统接过来、传下去，你们还有后一代。将来你们要向你们的后一代交班，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我们国家就可以实现“长治久安”。

现在的政治局、书记处是很好的班子。年轻，朝气蓬勃，办事效率高。最重要的是发扬民主，坚持集体领导，不搞一言堂。可以说，现在我们党近二十多

年来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最好的时期。从我们的政治局、书记处，可以看出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

你们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就贡献这么一点：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此时，华国锋实际上已淡出高层权力核心，叶剑英内心的纠结不言而喻。在1979年这一年中，叶剑英眼看着自己本想联合邓小平与其他老同志共同辅助华国锋以使他成为接班人的愿望已经无法实现，其内心自是十分复杂且十分忧虑。也就在这一年的年底，叶在广州期间听取冯文彬关于中央人事工作安排的汇报。在谈到华国锋等人情况时，他明确向冯表示：捉“四人帮”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指叶剑英、华国锋、汪东兴），如果我们有一个走漏消息，就会发生大问题。因此，他们（指华、汪）的功劳，我们不能忘记。他们的职务，中央要考虑安排。

1

冯文彬只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由他来向叶汇报涉及还是党的主席华国锋、副主席汪东兴等人的人事安排，显然是不正常的，至少是不合适的。当然，冯的背后是邓小平、陈云，不言而喻。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两天预备会议结束后，华国锋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去年4月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了国民经济的调整问题，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九月底，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主要讨论通过了叶剑英同志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到现在将近5个月了。从三中全会以后，全党上下做了大量的工作，促进了我国政治、经济各方面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给我们党提出了一系列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全国人民也热切希望我们在进入80年代，在粉碎“四人帮”三年多来取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快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步伐，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为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及时召开五中全会。

关于五中全会的任务，也就是中央政治局提请全会讨论的议程，在会议通知中写了六项。在预备会议上，薄一波同志建议把有些问题从“其他”一项里抽出来，我们觉得很好，就把议程改为七项：

一、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

¹ 《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第1181页。

二、增选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选举产生中央书记处；

三、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

四、讨论和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五、讨论和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六、讨论和通过根据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决定。

七、其他。

在谈到关于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时，华国锋指出：党的十一大，是在 1977 年 8 月，即粉碎“四人帮”不到一年的特殊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大会对于推动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对于健全党中央和各级领导，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都起了重大作用。但是，限于当时复杂的历史条件，十一大对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还不可能看得很清楚，或者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不可能把一些重要的原则问题解决得很完善。按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十二大应在 1982 年举行。但是，自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形势都有了重大的发展和变化。现在，自从三中全会提出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团结、思想上进一步解放、经济上在调整中前进的可喜局面。当前的国际形势，总的说，对我们也非常有利。我们党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特别是我们工作着重点转移了，有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需要不失时机地加以解决。为此，中央政治局认为，提前召开党的十二大，总结十一大以来的工作，修改党的章程，通过发展国民经济的长远规划纲要，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这些工作都是十分必要的。关于召开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主要议程、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产生办法等问题，都要提请全会讨论，这些问题在提请全会讨论、通过的决议（草案）和说明中提到了。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进行讨论。至于具体召开十二大的时间，想力争在今年底召开。通知上没有说明十二大具体召开的时间，想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以后，委托政治局根据会议准备的情况来确定具体召开时间。因为今年工作量很大，考虑到还有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政治报告，党章和党章修改报告等

等，如果准备不及，可能要到明年。所以，我们留了点机动余地，没有具体把时间写死。

关于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问题。华国锋说，鉴于汪东兴同志犯了错误，这一次他写了请求，免除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职务，这次全会要解决。这样，中央常委就留下5位了，为了充实中央常委的领导，想在这次全会提名两位同志，就是胡耀邦同志和赵紫阳同志参加中央常委。

就关于成立中央书记处问题。他向大家介绍说，在党的八大以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10年中，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领导下，曾设立过中央书记处（八大以后，成立书记处的经过历史，在13个人的简历后面已经印发给大家参考。）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做了大量的工作，起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鉴于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异常艰巨和复杂，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能够集中精力，考虑和决定国内外事务中的重大问题，同时使党的各方面大量日常工作能够及时地有效率地得到处理，中央需要建立有系统地进行经常工作的机构。成立书记处，酝酿比较久了，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这一次我们觉得时机成熟了。参照过去的经验，经过必要的酝酿和准备，中央政治局提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并在这次全会上选举总书记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关于中央书记处的组织办法、职权范围和工作制度，决议草案中也提到了，今后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请同志们审议，经全会通过后，我们就按照这个决议进行选举。

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党章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法规。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十一大通过的党章，无论在内容和结构上都还不完善；有些内容和条文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错误提法。所以，在十二大时，就需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思想和我们建党的丰富经验，进行修改。为了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我们党的建设上的流毒，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提高党员质量，提高党的战斗力，坚持并改善党的领导，以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广大党员和我们党的干部都希望能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我们党的建设的优良传统，同时根据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上出现的新问题，修改出一个有时代特点，比较完善，比较好的党章来。基于上述考虑，在四中全会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并且组织有关同志，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修改出了一个党章草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又做了一

些修改，现在提请全会讨论。这个党章修改草案，请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因为这一次的修改草案有一些重大的改动，特别是解决终身制，党的领导新陈代谢这些重大问题。所以，希望同志们充分发表意见。将来根据全会讨论的意见，再作修改后，发到全党，广泛地征求意见，集思广益。全党讨论后，再集中起大家的讨论意见，进行修改后，提请十二大审议通过。

对于讨论通过根据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的辞职请求，免除他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决定。华国锋没有过多展开，他只是表示，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考虑，他们写了检讨，请求免除他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我们觉得，现在是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再不解决，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都有意见。所以，这次拟提请中央全会讨论，接受他们的请求，做出免除他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的决定。

华国锋最后讲，上面讲的这次全会几项议程的主要文件，在北京，我们邀请了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准备列席这一次会议的同志和一部分老同志，开了三天会，在外地的，把文件也送出去了，在外地按系统组织同志们阅读讨论过了。所以，这一次会议我们预想只开5天，紧凑点，不开长会，开有准备的会，开短会。具体日程已拟了一个表发给大家。因为我们考虑，开的时间长了，一个是同志们留在这里时间长了不好，再一个，在国际国内，特别是在国际上，又要说中央又有了什么问题了，开的时间这样长也开不完，所以我们准备得精炼一点，抓得紧一点，事先把文件已经发了。昨天我听广东的习仲勋同志说，他已经把修改的意见在本子上改出来了，所以，我们时间可以抓紧，开得快些。在我们今天的全体会议以后，从明天起，分组进行讨论，希望同志们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发表意见，经过分组讨论，然后再举行全体会议，通过决议，选举中央书记处，通过全会的公报。

29日，邓小平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我们从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就是组织路

线方面的一件事。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比如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成立书记处等等，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大大地前进了。

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他提出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也可以在某些纪念文章里给他恢复名誉。总之，在我们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有些同志的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就不必再要求中央发文件，过多地发文件并不好。

接着，他谈到了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主席用中国语言概括起来，在党校的大门写了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我们有一段时间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实行四个坚持。这条思想路线包括四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离开四个坚持，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因为没有根，也没有方向了。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不能伤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看越显示它的重要性。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结合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国内又是各行各业的）新问题。

邓小平最后说，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总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1975年王洪文说：10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起这件事，是呀，75年我已经71岁，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5年以后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同一天，李先念在发言中对这次会议做出了自己的估计。他说，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正像小平同志所说的，是一次胜利的会议，是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的会议，是加强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会议，是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继续。三中全会主要解决的是政治路线、思想路线，这一次主要解决的是组织路线，这样，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就完整了。刚才小平同志讲了，这个工作不完全是在三中全会做起的，以前就做了。当然，那个时候我们认识的水平不像今天这个样，老实讲，还受到很多思想束缚。可以这样说，这次组织路线的解决，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党的方针政策，必然得到更加坚定有力的贯彻。现在我们讲统一思想，统一到哪个地方呢？只能统一到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这次的五中全会，不能统一到别的地方去。要统一思想必须有一个组织路线来保证，事情是要人做的。这次五中全会，是我们党的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次会议，不仅现在起作用，而且会长远起作用。

他又说，这次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这一点十分重要。记得九大时，听国锋同志跟我讲，当时是怎么选中央委员的呢？大体是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多。我不是说全部都是这样，也不是的，也有很好的同志。因为那次代表大会的路线不对头，搞的又是假民主，集中也不是我们党历来实行的集中，因此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不行。十大比较好了一点，但也还是不行。粉碎“四人帮”以前，在1975年，我同小平同志议过这个问题。我说，中央全会开不得，中央全会一开，他们就一哄闹起来了。那个时候晓得是些什么样的人啦？恐怕坏掉的人不少。这次书记处成员的选举，充分发扬了民主，反复进行了商量，结果

表明实现了很好的集中，或者说高度的集中，正确的集中。顺便讲一下，搞差额选举，这个原则是对的，但究竟这个差额选举是不是一定就那么理想？还没有很好的经验。过去毛主席提出，多民主，多协商，上下商量，左右商量，然后再差额选举，总还是比较稳当一点。

对于大家的发言，李先念说，我感觉水平很高，证明我们这些老同志、老家伙有经验，大家都是认真想了问题的。讨论中间，很多同志发表了非常好的意见，既看到眼前的问题，也看到了长远的问题。比如对书记处成员的讨论，大家提的意见都很好。再比如对四个犯错误同志的批评意见，我看是既有事实，又有道理（当然罗，可能有的事情也不一定讲得那么准）；既充分发表意见，又顾全大局；既讲他们共同性的问题，又区别不同的情况；既认真开展了批评，也允许犯错误的同志讲话。这就是好嘛，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嘛。从各方面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发扬起来，我们党就有希望。陈云同志在会议开始时的第一次讲话，我很同意，他说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要扭住不放。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我有切身体会，别的同志比我体会得更多，更深刻，那个时候检讨没个完。你第一次检讨，说你根本不行；第二次检讨，说这一次比那一次有点进步，但说你还没有触及灵魂。究竟这个灵魂在哪个地方，搞不清楚。没完没了。这一次，四位同志受了批评，他们自己讲了些意见，也做了些检讨。当然，检讨的好坏程度有很大的不同。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的处理，我赞成留有余地。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全党的团结。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这样做的。

李先念一再肯定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非常好。当然，三中全会也开得好，四中全会也开得好，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很多会议都开得很好。这次会议处理的问题，都是很大的问题。会后为传达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我们还要做很多艰苦的工作，因为这个问题一联想起来就联系到了老人家。今天是党的中央会议，我就讲了这句话。当然，我们还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讲得很好。我们接触外国人比较多一点，不仅是兄弟党、兄弟组织，就是包括民族主义国家的领袖，比如莫桑比克的总统萨莫拉，现在他完全跟着苏联跑，我去他们那里访问的时候，他就谈到了毛主席。他说，你们不能够把毛主席都否定了，否定了，我们就不好讲话了。我们要估计到，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传达以后，国内国外，议论很多。国外，无非是两种议论，一种议论是说，中国共产

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实事求是，不隐瞒自己的问题；一种是挑拨离间。国内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总之，要求我们做很多艰苦的、细致的、耐心的工作。

关于接班人，李先念说，剑英同志讲了，很多同志讲了，是个人接班还是集体接班，这个问题提得非常之好，讨论得非常之好。剑英同志说，集体接班总比个人接班好。这个问题，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历来就没有解决好，包括列宁在内，没有解决好，教训太大了。中国共产党现在提出一个集体接班的问题，我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发展。当然，还要在实践中间不断地完善。毛主席曾经把党的领导，把中央的领导，分成一线、二线，这个设想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后来没有做好。到了成立文革小组以后，一线、二线根本就不存在了，政治局也没有了，书记处光了。现在成立新的书记处，实际又恢复了一线、二线，这个设想我说是好的。如果发生意外，照毛主席的话说，我们可以比较经得住风险，党的事业和国家的事业就比较有保障了。

李先念认为，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问题上，实际上解决了一个个人接班还是集体接班的问题。他最后讲道：这次党章上提出不搞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我看这个问题提得好。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的教训也很大。人总是要受客观法则的限制的，就是受年龄限制的，这个限制没有办法改变。当然，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一些老同志多活几年。不要说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那个话实现不了，但是多活几年是可以做到的。在党的事业顺利地向前转移的情况下，接班问题也很重要。我说的这个转移不只是说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方面来，而是说整个党的事业，通过集体接班，一代一代地继往开来，向前进，搞得更好。如果我们几十年不发生问题，百年不发生问题，我们的领导人有继承人，一代一代地继承下去，不再折腾，我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有希望。

继 24 日关于设立书记处讲话之后，叶剑英于 29 日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又做了第二次讲话，就四个人辞职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我完全同意这次全会关于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位同志请求辞职的决定。我想对四位同志提点意见。

四位同志在历史上为党做过有益的工作，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些同志也出了力，现在的地位很高，党中央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都是政治局委员。但是，在党和国家处于存亡之秋，需要更多的同志挺

身而出的时候，他们四位经不起考验，把个人的益放在党和国家利益之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在思想路线上没有同林彪、“四人帮”实行决裂，又犯了新的错误。党在适当的时机，比如在党的三中全会和这次全会，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挽救他们，是必要的，正确的。

经过大家多次批评帮助之后，四位同志做了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评，并且提出辞去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的请求。这次全会的讨论和表决证明了民主（党内的民主，人民的民主）的力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力量，证明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的政策是正确的。这不仅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而且促进我们党更进一步团结，使得我们党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

四位同志犯了错误如何变消极为积极，由被动转为主动，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当教员。一个同志犯了错误，只有如实地把错误讲清楚，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好好向群众作交代，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改正，就可以取得群众的谅解，恢复人民对自己的信任，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工作。只有走这条路。所以，我想请四位当个教员，不仅不要有怨气，不要总是自以为是，而要自以为是。最好是下去，到群众中去，有机会就讲讲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勇于检查和改正错误的。

四位同志所犯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害。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反应很强烈，要求严肃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有利于党和国家的大局，也有利于安定团结。如果不处理或处理不当，就会失人心，误大局。政治局很重视这件事，对四位犯错误的同志做了许多工作。华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陈副主席，都分别同犯错误的同志谈了话，进行诚挚的帮助，启发他们觉悟。四位同志在这次会议上做了检讨。当然，检讨的深浅不一。我们大家允许四位同志对错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热忱地希望他们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真正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这四位同志提出辞去他们所担任的党内外高级职务的请求，党的全会批准他们的请求，做出了相应的决定。在解除他们党内外的高级职务以后，不做过分的处理，要在政治上给予关心，生活上给予照顾，按照他们所犯错误的严重程度和他们对待所犯错误的态度不同，酌情分配适当的工作。这样处理对不对呢？我认

为是非常正确的，既不是放任不管，也不是一棍子打死。全党要树立一个风气，对一切犯了错误的同志，党必须要过问，必须要帮助他纠正错误。每个犯错误的同志，一定要接受党的批评，接受群众的教育。不论职务多高，过去功劳多大，犯了错误，危害了人民的利益，危害了党的利益，都必须纠正和处理。

“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这句话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是我们党自延安整风以来的好的传统。违反这个传统，对错误不批评，不处理，或者一犯错误就“不准革命”，都不好。处理过分了，一棍子打死，在历史上都没有产生好的结果，我们要引以为戒。这次中央对四位同志的问题，用自己检讨、自己提出辞职的办法进行处理，是很慎重的，我相信一定会在全党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做也向全世界证明，我们党会更加团结，我国人民会更加团结，我们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是有保障的。当然，造谣的人总会有的，国外敌人也会造谣的，但是，当大家对事实真相明白以后，谣言就会消失。所以，这样处理，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好的。

我对这四位同志有这个希望，就是希望他们做教员，这个教员会教育他们自己，也教育我们，教育人民。

陈云在这次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除了前述谈了关于书记处的设立外，还谈了他对四人辞职的意见：一个同志对自己的错误，现在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不够，就把这个问题记录在案嘛，不要急。我们应该全面地考察一个干部。所谓全面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同志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该看到他在党内做过什么好事，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必须看到当时党内的整个情况，这些同志是在当时党的整个情况之下犯的错误。就犯错误的同志来说，不要自己觉得委屈了。我说，应该想一想，想什么问题呢？想这样一个问题，想一想我是否可以不犯这样的错误。有的同志看了犯错误的同志的检讨不满意，可以提批评，被批评的同志应该听批评的意见。我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过去是有过这样一个时期，检讨没有完没有了，批判没有完没有了，从来都不说可以过关了，直到最后会开不下去了，大家散会了，完不了也只好暂时算完了。我不赞成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扭住不放。这种检讨没有完没有了的情况，我认为不是党的好作风。党接受了他们的辞职以后，党在政治上要分配他们几个人做工作，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们的需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五个常委发言中，只有邓小平讲话没有涉及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四人辞职问题。也许在邓看来，他要考虑的是，现在已到了该建立自己的统治架构，让华靠边站的时候了。

事实上，在经过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的人事变动后，华国锋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但这个主席已经成为“名义主席”了；而他仍担任的总理职务，仅过了两个多月就交由赵紫阳担任了。❏

【人物】

军代表门双成

于向真

我姥爷、我父母、舅舅，我哥哥嫂嫂、妹妹，都曾是军人，我对军人有种天生的崇拜。1966年初春，我给毛泽东写过信，表达的就是想早日参军报国的热望。但我参加工作不久，从单位革委会主任、军代表老门身上，认识到军人的另一面。

一

1969年3月5日，90多名北京49中学的初、高中生被分配进北京第三通用机械厂做学徒工，当时不叫参加工作，叫“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不管叫啥，结束了停课近三年游手好闲虚度的青春岁月，有工作能自食其力了，我们高高兴兴迈进厂门。

进厂第三天下午，工厂革委会主任、军管组组长老门到新学员班接见我们，老门50岁上下，中等偏高的个头儿，圆胖大脸，一笑就眯成缝儿的双眼，加上一身黄绿色的军装，显得既威武又慈祥，他代表军管组欢迎我们加入首都产业工人大军，鼓励我们努力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把自己锻炼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接见的氛围相当活跃，散会后，门代表没有马上离去，亲切地和我们交流，有同学问他：“门主任，您说我适合干哪个工种呢？”老门上下打量后，对她说“你学车工吧，车工技术强。”我们即将面临分配工种，都盼望自己被分到技术

强的岗位，所以那位同学听后乐开了花儿。最后轮到我问：“您看我适合干车工吗？”老门打量我一下，笑着回答“我看你适合当个电焊工。”话音一落，同学们都笑了，我臊了个大红脸，那天上午我们刚参观各车间，见到身手敏捷、工装洁净的车工，大家都羡慕，观看厚重防辐射工装被火花迸溅成千疮百孔的电焊作业时，没有人想干这一行。

第二天公布分配方案，我果真被分到有电焊班组的装配车间，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新学员班班长找我谈话，劝解道“别心烦，电焊工有技术，工作也不太累，这是照顾你呢。”到装配车间报到后，因钳工一组大组长点名要我，理由是“需要一名能教唱歌的学员”。之前我是红卫兵合唱团的领唱之一，随团四处巡演过，在新学员班上也领唱过，因此我被分进钳工组。有个女生临时被调换为电焊工，她好长时间跟我闹别扭，她的心情我理解，我俩都没决定权，只能服从分配，文革结束后她第一个离开工厂，家人把她安排进党校工作了。

三通用机械厂位于北京东郊双井地区，钳工一组大车间紧邻工厂北大门，离厂部办公室很近，军管组组长老门和厂部领导时常来我组视察。老门和几位师傅熟悉到能彼此开玩笑的程度，使我对这位军管组组长的印象更好了。

二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谋求连任，来中国访问，毛泽东会见了，叶海亚·汗想连任不能差钱，就尽力奉承毛，毛一高兴，慷慨地许诺给他5个亿，毛伟人语调轻松地对叶海亚·汗说：“我们扫扫仓库，5个亿就有了。金口一开，全国开始清仓扫库，“清仓扫库”成为文革大波澜中的一朵小浪花。

我厂是文革中北京市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历次运动冲在前，这次也不例外，为此工厂举办了“清仓扫库展览”，从各车间抽调能写善画的人筹办展览，包括3名美工和4名讲解员，我作为讲解员脱产进入筹备组。

第二天，门代表来视察，先鼓励了美工，再与我们4名年轻女工逐一单独谈话，他的注意力马上集中到小刘身上，指示让小刘担任讲解小组长，负责讲解第一部分，门代表三番五次找小刘单独指导工作。18岁的小刘，身材苗条，清丽脱俗，一笑两个浅浅的小酒窝，言谈举止十分可人。很快知晓老门不仅关心展览

进度，而是替自己儿子做媒，不出半年小刘就嫁入老门家成为军代表的儿媳妇。按说老门是军管组组长、革委会主任，3000多员工国营企业一把手，小刘的好运该被工友们羡慕才对，可事实却相反，婚后，小刘惯常的笑容消失净尽，连当初嫉妒小刘的女工们也纷纷起了恻隐之心。

和小刘一起办展览相识，展览结束后因我俩的车间紧挨着，她时常找我说说心里话。一天，小刘红着眼来找我，我引她到更衣室，刚一坐定她就抽泣起来，我抚着她的肩安慰着，哭了会儿她告诉我，婚姻令她极失望。老门的儿子过于木纳，不懂体贴安慰，小刘的婆婆、老门的妻子没工作，是前几年刚从乡下进城的随军家属，话很少总板着脸，让儿媳妇无所适从。老门在单位说一不二，回到家也独断专行，最让小刘难受的是这家人出奇抠门，日常花销细算到分厘不差。

“每天晚饭做好了，家人到齐先不开饭，要结清当日全家的开销。昨晚因为差了一毛四分钱对不上账，老门气得直拍桌子，他越急家人越慌神，怎么也想不起来，婆婆死盯着我，弄得我连晚饭都没吃，最后婆婆终于想起自己上午买过一瓶醋忘了记账，这才完事。夜里我又气又饿睡不着觉，听缺心少肺的丈夫打了一夜呼噜，恨死我了。”小刘的一番话，令我无言以对，只能傻傻地冲她苦笑。

三

一提起军代表，上点年纪的人会立即联想到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期的军代表给人们的印象太深了，军威滑坡第一波浪潮起于文革军管时期，第二波事发80年代末大家心知肚明，王守业、谷俊山、徐才厚、郭伯雄等一大批军中老虎落马大约是第三波了。

1966年春季动乱初起，学生停课闹事，夏秋两季打砸抢烧血腥恐怖，到了年末，全国各类学校、机关厂矿的领导体制均被摧毁，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公安、检察、法院等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几近乱套，工矿企业停产或半停产，文革陷入到无政府阶段。1967年初，毛泽东支持并推广上海的“一月夺权”，造反派全面夺权，“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局面难以收拾。

为了掌控局面，确保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毛决定派人民解放军介入地方，发出“三支两军”的指示，派解放军介入地方，执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

军训五大方面的任务。“支左”就是支持革命“左派”“支农”“支工”是派部队去统领工农业生产，“军管”是派部队对地区、部门、单位、系统等实行军事管制，“军训”是派部队对大、中专院校师生进行军事训练。自此，解放军全面介入文革，先后派出 280 多万名干部和战士参加“三支两军”，我厂军管组组长是老门。老门是一名河北籍老兵，文革前是北京军区某部营职干部，来我厂当军管组组长、革委会主任之前的职务是某部后勤物资科科长，负责日用品（被褥、墩布、扫帚等）的保管与发放。

1970 年，我厂革委会从各车间选派几个年轻人当红医工，装配车间选了我，先被派到 301 医院“新医门诊部”学习针灸，3 个多月后回厂，同去的一名学员回车间担任不脱产的红医工，我被分到医务室注射部为病人打针。原先管打针的瑞护士带了我半天，她就去门诊部当医生了。

我厂医务室大致像现在的一所小型社区门诊部，分内、外、中医、理疗科、药房和注射室。我被分在注射室负责给病人打针，打针是简单技术活儿，比当钳工轻松多了。注射室分内外两小间，外间有一把椅子、一个半高台子，病人坐着或趴着接受臂膀、臀部的注射，里间有张小床和桌椅，供静脉注射或打点滴用。我立即发现一个怪现象，军代表老门隔三差五往注射室跑，其他工友来都是我给打针，老门一来身后必定跟着瑞护士，瑞护士客气地把我请到外间，把自己和门代表关在里间，门销一插。每当这时，我在外间相当于给他俩望风，凡来打针的一律先请在走廊等候，17 岁的我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头雾水、如坐针毡地听着里间的杂音。

医务室郭主任私下告诉我，瑞护士是老门的相好，老门替瑞护士说了话，瑞护士被提拔成瑞医生了，“要不哪轮着你到这儿来啊”。她又说：“看吧，就瑞那水平，不把人治出毛病才怪呢。”一听这话，我顿感自己的处境不妙，再不肯充当把门儿的角色，只要瑞护士和老门一来，我马上借故溜走，注射室外屋就空了。于是有人听到并传扬出去，军管组组长兼革委会主任老门和漂亮护士的绯闻不脛而走。

郭主任猜对了，两个多月后，瑞护士果然闹出医疗事故，她给一位工人开错了药方，剂量高出数倍，服药后那人上吐下泻送去同仁医院救治。郭主任息事宁人，打发瑞护士回注射室，我被调到针灸室协助小郑医生工作。又过了半年，嫉

恶如仇的我，无论如何忍受不了医务室那些半公开的泡病假、假职工之名替他人开药等一堆龌龊，就拜托我师父王知仁和钳工组成敦组长，他俩和装配车间主任找到厂部，借口“大会战”生产任务重把我调回原车间。重新当工人，突然感觉工人师傅们如此淳朴可爱，干活都不觉得累了。

四

大约在1972年前后，社会上掀起一股“反对不正之风”的浪潮，其间我厂大门口突然贴出一大排大字报，密密麻麻的毛笔小字揭露了工厂领导拉帮结派、多吃多占、走后门等歪风邪气，矛头集中在老门身上，列举出大量事实，说他和几位军代表短短几年内，往我厂安插了数十位亲友，连不识字的农村亲戚也被安排到工厂最轻松或享受补贴的岗位上去，列举了革委会和军管组成员吃拿卡要工厂食堂、仓库物品的事例，详细到某月某日某人，列举了军管组成员伙同几名脱产干部三伏天工人们挥汗如雨干活时，他们躲进阴凉的地下防空指挥大厅里“敲三家”打牌的劣迹，列举了军管组某干事来厂不到两年，搞到手好几位女工，并把某护士（复员女兵）从某电工手里生抢过去、弄大肚子后不得不娶回家等等，也捎带点了老门与瑞护士那人尽皆知的风流韵事……

大字报一贴出，观者呜呜泱泱前三排后五排的，厂区顿时舆论大哗，我所在的车间班组里，大伙儿都无心干活了，三三两两聚成一堆堆议论纷纷，发泄着对军管组的强烈不满。很快，那一长排大字报就被人泼上水、用竹筴帚刷掉了，各车间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上级精神：“走后门等问题，留待运动后期解决，现在大家要抓革命、促生产，再议论这些事将被以破坏文革论处。”方兴未艾的“反对不正之风”嘎然而止。

这一年8月底，上级发布通知，“军代表在文革中支左立下赫赫功劳，密切了军民鱼水情，圆满完成军管任务，光荣地回归原部队……”老门们黯然地“载誉”撤离，留待运动后期解决的那些问题也不了了之。

几年后，我被调到工厂劳动工资科当劳资员，那是三通用鼎盛时期，已有4000多名职工。我发现每月厚厚的工资表后几页，全是无科室车间编制、只领工资不见人的名单，一问是各式各样的关系户，好几十人从来不上班，每月按这份表到工厂财务科出纳员那里直接领钱。我找科长提出异议，科长很为难，最后

妥协的办法是我不再负责工资管理，只管核算职工奖金系数兼全厂劳资统计。

我对面办公桌的老张负责人员调配，他让我看过一些统计表，从上面我清楚地获知文革期间在我厂参加军管的几位军人，陆续把好几十名亲友安排进我厂，其中安插人最多的就属军管组组长老门，他介绍来的人全被安排在最优岗位。工友们虽略知一二，但不明就里，分不清哪些人是谁的关系，又怎样侵占了大家眼馋却不得其门而入的职位。几十年后再看，即使工友们明白了，即便全体国人都清楚了，又能怎样呢？

【人物】

贫穷逼出来的“抠八”

——某军宣传干事常仁琐记

刘家驹

嘲笑人的吝啬，俗称抠门。四川方言谓之“抠八”。这一绰号通常是用在男人身上，女人持家哪怕手再紧，也会得到顾家媳妇的贤名。唯男人在人际交往中的抠抠搜搜，特讨人嫌。我的一位战友常仁，对人对己抠得不近人情，机关好些人都不呼其名，直叫他“抠八”。其实他的抠不是天性，而是给贫困家庭逼出来的。我的这篇文章，就是为他正名。

一

那是1961年秋，我刚任职炮团训练队副队长，就被借调到军部为一位副军长代笔撰写解放重庆的回忆录。军部住浙赣线上一座中等城市，我下了火车刚出站口，见接站人攒动的头顶上，一块纸牌书有我的大名，举牌的是一位戴眼镜的军人，我快步走近他，自报了家门。对方说：“我叫常仁，军宣传处的干事。”

浓重的川音使我顿感亲切，我打量他，个不高，清瘦，一脸严肃。他把牌子夹在腋下，说了声“走”，就领我出站，上了辆军用吉普。小车驶向城郊一片铁丝网围住的园林，这里我来过，军部司政后机关大楼就掩映在树林中。小车开到礼堂的边门停了下来，下了车，常仁带我进到礼堂的耳房，一进室内，满屋闷黑，堆的全是杂物，像库房，放列却齐整。常仁说：“年前军文工团解散，留下的衣

服道具都交我看管，我在这里给你开辟了一块小天地。”

他走在头里，通过货栈般的巷道来到耳房的一角，果然，这里用十多个书橱隔成一个十二三平米的小间。常仁说：“本想安排你住招待所，那里是闹市，你还得天天往军部跑，不方便，住这里委屈些，您看合适不？”我环视未来的工作起居，一张单人床上已铺上枕头被褥，床头小柜上有热水瓶，墙边矮桌放置了盥洗盆具，写字台临窗，光线柔和。我说：“很好，谢谢你的精心安排。”

他那张板实的脸上露出笑容，说：“往后，你有事就找我。”

放置好行装，已到晚餐时间，常仁带我到他们政治部的食堂就餐。他先到事务室领来一张菜饭卡交给我。卡片像月份牌，上有主食米饭馒头，副食只有甲菜乙菜丙菜，价格都是固定的，月终结账。

食堂不大，紧紧巴巴地安置了六张餐桌。厨间的案板上摆了三盆菜，一个炊事员正在执勺划卡售菜，另一个窗口由一个炊事员专售米饭馒头。常仁告诉我说：“甲菜两毛，乙菜一毛六，丙菜一毛二。乙菜不见肉，只有几颗油花子，你就买丙菜，划得来。”

来食堂就餐的人很少，都是单身汉。我买了份丙菜和三两米饭，随常仁坐在一桌吃开了。他没买菜，吃的是自己玻璃罐装的咸萝卜干，上面还有一层厚厚的辣椒面。我见他那嚼动的嘴唇和清瘦的脸庞，心底泛起一阵酸涩。是不是大饥荒还在困扰着他？他见我不解地望着玻璃罐，便解释说：“我的咸菜比你的菜有营养，成本才5分钱。”

我说：“你的菜没油水啊。”

他说：“你的丙菜又有多少油水？”

的确，我的一小盘菜全是莴笋叶子，又少得可怜，差不多一片叶子伴一口饭在吃。

我问常仁：“您顿顿如此节约？”

他摇了摇头说：“午餐跟你一样，买个丙菜。”

常仁边吃边告诉我：“机关干部每月每人能得到一斤黄豆、半斤白糖的补助。处长要我向部领导写报告，把你列入我们处的暂编人员，享受‘特供’待遇。”常仁补充说，“大饥荒以来，政治部就有13人得了肝炎，白糖和黄豆都是副军长从地方走后门弄来的，千万别乱传，传开了要坏事的。”

这类紧缺物资，在基层不会有份的，我感激宣传处的眷顾。

晚饭后，常仁带我进城逛大街。街道清冷，主要街道的商店还在营业，上门的人不多。常仁说：“小摊小贩那里东西多些，就是要价高，一般人吃不起。”

我们来到一条街的巷口，一群人正围着一挑西瓜购买，两毛一斤。常仁挤了进去，挑选了个小西瓜，上秤一称，二斤二两。常仁不放心，拿过小贩的秤端详了一阵，掏出一叠毛票，清点了两次，给了小贩四毛二分钱。

回到大院，常仁只要见到熟人，就举起西瓜吆喝：“老伙计，到我那里啃西瓜。”对方见到他的小西瓜都笑了，说：“抠八啊，西瓜皮别扔了，还可以腌着吃。”

回到办公室，我在他办公桌前坐下来，他从抽屉里取出把小刀，把西瓜切成十牙，我吃了两牙就歇了嘴。这瓜上市有好些天了，有酸味，常仁劝我：“便宜的东西，味要差些，你就放心吃，坏不了肚子。”他见我不动，一口气吃了八牙。

常仁分管文件，又是单身，一直住办公室，他用文件柜隔成了个五六平米的小间独居。办公室大，白天有三个干事在这里办公，晚上就是他的天下。

处长来探望我，要我树立长期思想。他懂行，知道代笔撰写回忆录不是搞新闻报道，要找众多的当事人细说战斗过程和英模事迹。处长特别嘱咐说：“你没有解放战争的经历，所获的口述记录要去查询真伪，常仁会从档案室里找来相关资料帮助你鉴别。”处长把我纳入宣传处的一员，要我参加他们的组织生活，这是对流动人员的一种约束。处长说：“你的工作、思想都可以向常仁汇报。”

处长还向我介绍起常仁的历史。

常仁是1950年春从四川参军进入军干校的，朝鲜战争中立过二等功，回国后升任师党委秘书。五年前，处长下部队发现他工作作风缜密，调来宣传处做了内勤。他出身好，祖上三代都是贫农，上呈下达的文件、指示报告，都放心他收转或保管。文笔不错，对全军的政治教育，部队的思想动态，每月都由他整成简报上送军党委或军区宣传部。他还担负全处的日常杂务。宣传处有干事一大堆，分管宣传、教育、文化、文艺、报道、摄影，还有资料室、图书馆、电影站，人数相当半个政治部，粮票薪金及各种购物票证，全由他领发。

处长说：“常仁办事认真负责，是处里的好管家，年年都评为政治部的先进工作者。您的采访安排和吃喝拉撒睡由他包了。”

二

刚住下的第二天晚上，我正整理采访笔记，忽听得库房一头传来刺耳的缝纫机声。我赶过去想提醒干活人的动作放轻些，一见是常仁在一个小隔间里修补衬衣。衬衣袖口毛了，他正在锁边。见我到来，说：“你今天的采访如何？”我说：“很顺利，都是你安排得好。”我发现他修补的衬衣没有领，感到怪异，问：“你就这么不带领穿它？”他停了机，脱下军上衣，说：“你看看，我衬衣和领子是分家的。”我近前一看，套在他肩腋下的衣领是个空架子。我感动地说：“没想到你是如此的节省。”

常仁说：“我要是一个人过日子，会是个富农阶级，现在一大家子，不省吃俭用，全家就要喝西北风。”

常仁告诉我，他不单会缝补穿用，还会编织毛衣，他的内衣内裤床单被褥，都由自己制作；袜子也是布做的，布料是老娘织的老土布。常仁洗涤衣物从不用肥皂，一块肥皂钱可以从市场买回两斤皂角，砸成汁能用上半年。

“我家穷惯了，共产了更穷，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

听得出，他的心底似乎还隐忍着极大的不平。

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除了整理采访笔记，翻阅资料，就和常仁闲聊，他本性质朴，又是直肠子，什么都会向你吐露。

有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他在山里捉猴子的故事。

大山有虎、獐子、野猪，猴子最多。常仁家在林间、岩边种脚板苕，不断被野猪拱食；种的苞米常遭猴子洗劫。常仁父亲最会抓猴子，这是他家的一项重大经济收入。

每年秋天，常仁在父亲指导下，用上百根楠竹搭成像房间大小的竹仓，仓底铺上一层苞米粒做诱饵。这帮灵长类是不轻易上当的，先是几个大胆的猴子踩点，试探有没有暗算他们的机关，以为安全了，下到仓底就发出尖利的呼叫，群猴三三两两地来了，小心翼翼地仓顶洞口窜入，进得仓的边嚼苞米粒边蹦跳欢呼。躲在林子深处的常仁，见入仓的猴子数量差不多了，猛拽手中的一根长长的拉绳，仓顶洞猛然关闭，仓内猴群像炸窝般惊呼狂叫，有的把脑袋挤出竹墙缝。这时，常仁提着几只公鸡到仓顶，先宰一只，拎着鸡身把血洒向仓里的猴群。猴子生性

怕血，哆嗦着捂住脸。“杀鸡儆猴”的成语就是这么来的。常仁连连宰杀了两只公鸡，直到每只猴子身上都有血了，才抱来一捆竹鞭和套绳，他下到仓底拉出一只猴子就用竹鞭猛抽，把所有猴子打的半死不活才给他们套上绳索，再关进竹仓。商人进山来收购，以两块大洋成交。每卖出一只猴子，同时要给买主抽过猴子的竹鞭，这是猴子终生敬畏的法鞭。差不多每年常仁家能收入上百元，要不是共产党来了，常仁家的积蓄可以买下一大片山林。

常仁说：“我家要是成了地主，我敢说，我家的财产全是劳动所得，没有丝毫剥削。你看看现在，贫下中农家已一无所有，不知哪一天，中国会出现李自成，你信不？”常仁越说越沉重：“公社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林子砍光了，不但抓不到猴子，连柴火都拾不到了，一天就靠一毛钱工分过活，老爹老娘浑身浮肿，我担心老两口离大限不远了，我趁春节前回去，给老人安排后事。”

常仁还提起两桩耿耿于怀的事。

一是他家成年累月辛辛苦苦积攒的 500 大洋存放在地主家，土改时给工作组没收了，硬说是阶级观念糊涂为地主窝赃。父亲挨了斗，还撤销了村的贫协组长。

二是他家屋前有棵樟树，是明末高祖迁来时种下的，树龄已三百多年，长的已有一抱粗。公社化后山林没有了，公社副社长盯上了这颗参天大树。去年常仁探家，自己动手砍这棵树，截成三节堆放在屋后墙根下。这是常仁最记挂的一块心头肉，他担心，不知哪天会给副社长弄走。他决定今年探家时给老人做成寿材。

三

一次，常仁摆起了他的家世，说自张献忠洗劫四川后，他的祖上从湖广迁来荣昌大山就没挪过窝，世代都给地主看护山林。地主待人宽厚，给他家不小的自由，可以砍柴、挖药、猎野物，在林间的空地或石窝窝还可以点种些红苕、苞谷。靠山吃山，挑些山货赶场上市，赚来的钱够全家零用，常仁上高中的学费也不愁。

常仁对党在农村中的政策有自己的看法：“共产党来了，先是让地主减租减息，穷人欢喜了一阵子。如若给地主留下些利益，阶级矛盾会得到很好的调节，非得要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搞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消灭地主阶级，人们拿到土地证算翻身了吗？合作化土地归了集体，很快又搞人民公社，每天的一毛

钱工分，就是农民的全部利益，山上一草一木都姓了公，你要是动了手，公社干部就带领民兵来家牵猪宰羊，连下蛋的老母鸡都给抱走。”

“古往今来，老实巴交的农民胆小怕事，又最具有忍受力，赖以生存的条件要求很低，只要饱了肚子就阿弥陀佛。”

常仁懂得生存的法则，对党的怨怼，只能私下在真诚的朋友跟前诉说。

又一天晚上，常仁边拣选刚发的黄豆，边和我聊起他的家事。他说，在他生长的山区，根本不存在地主和农民的剥削关系。他认为，千百年来地主拥有的大片山林，是自己勤奋经营积累的财富，他们的产业交给穷人照应，都遵守着祖上传下来的契约。比如，护林人不得动山上的一根林木，打柴火剃丫枝，都要维护林子。林间种杂粮、捡菌子、打野物，财富取之不竭，收入再多，地主不会向你伸手。逢年过节，地主还要给护林人家礼送腊肉、糯米粑之类的年货，关系和睦，如亲如故。常仁家山下是大坝子，佃户都种谷子，和地主是租佃关系，收成是四六开或二五开，年成好就多交点，年成差就少交，从没人催租逼债。

提起土改，常仁更是愤愤然。常仁家乡是1952年初进行土改的。父亲生性耿直，认为他家为地主看护山林，是地主提供了丰厚生活资料做劳动报酬，是有恩有德的。地主厚道就有人气，工作组组织的斗争会费了老劲，几个昧心人的控诉，竟把天降灾、人病故，都说成是地主盘剥造成的。常仁父亲上台就放声大哭，他哭的不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苦大仇深，而是世道的浑浊，人心的沉沦。工作组还以为常仁父亲是郁结于心的阶级仇恨难于言表，安慰他，扶他下了台。

常仁家分得的浮财，有箱柜衣物和用具，常仁父亲正义又迷信，怕违天意遭报应，悄悄地送还了细软和锅碗瓢盆。地主给撵出自家大院，在一处岩边搭了个窝。十冬腊月天，常仁父亲夜间送去衣被食物。那几年常仁还在朝鲜战争前线，这些故事是常仁回国后探亲时，二老给他倾诉的。

我万万没想到，一个党的依靠对象，竟然与党如此离心离德！常仁的这些“反动思想”要是被人家知道了，打了小报告，即便常仁出身再好，也得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前些年反右，我所在炮团的一批老兄，指责政府的统购统销，是卡人脖子的政策；骂区乡干部多吃多占，为官不仁不义。这些言论比起常仁说的要轻多了，都给划为中右，发配到黑龙江垦边去了。常仁的出言无忌，让我担心。

四

春节将至，是常仁的探亲期，他从小年开始，就忙活收拾回家的行装——把床底下积存的米面、副食装进两只大麻袋，纸箱集存的废纸订成十多个作业本给孩子用。宣传处的同志，在此时都伸出援手，有给衣物布料的，有给粮票的，处长拿出20元给孩子做压岁钱，我把分得的白糖、黄豆全给了常仁，还给了几本《龙门阵》月刊，让他在路途上解闷。

腊月二十八，我起了个大早给他送行。他挑的两只麻袋鼓鼓的，足有七八十斤，到火车站七华里，一路闪闪悠悠的没有歇气。军人优先进站，他没排队就挑着麻袋进了行李房，检查过磅之后，他帮助搬运工把两只麻袋放到运行李的架子上，系紧绳索。这才拍了拍手，转过身来向我挥了挥手，进了站台。这是辆西去过路的快车，几分钟车就开动了。

回来的路上，我感到十分欣慰，凭常仁充沛的体力和欢愉的归心，那些积累一年的物资捎回家，他那苦难的家会欢乐几天的。

常仁走了，我也探亲，一个月后，我们又聚会在他办公室，他抓出几把花生、栗子放在桌上，算是对我的谢意。我俩边吃边聊，常仁像往常一样，又倾出一腔苦水。

常仁是大年三十到家的，父母重病，为了慰藉老人，请来了三亲六戚，摆了两大桌，还把带回的年货分了些给乡亲。过完初三，常仁就把屋后存放的三根樟木搬出来，自己动手解成板，妻子当了下手，忙活了几夭，钉成了两口寿材，父母看了很满意，说，到了阴间有住处了。

常仁像完成一项重大任务般的喜悦，那些天脸上笑意漾动，嘴里还能哼几句小曲。

一天，我采访回到政治部食堂就餐，刚进门，正碰上常仁端着碗筷出来，一见我就附着我耳朵说：“我出事了。”

我吃惊地注视着他那张阴沉的脸问：“怎么回事？”

“吃完饭来办公室再给你说。”

我三下两下扒完饭就来到办公室，常仁沉重的叙说了他出事的原委。

他回家前找了处长，提出要求政治部出份公函，让他带回去处理双亲过世后的棺木问题。他只对处长说，山区无法火葬，请求公社批给两立方木材。处长以

为小事一桩，告诉常仁：“我先给秘书处打个招呼，你用政治部的名义写个简信，交给他们盖个章就行了。”常仁却在写信时改动了内容，说他家樟树是祖上传下来的遗产，伐下后制成棺材是为双亲去世后安葬用的，请给予支持。没想到，一直在打常仁樟木主意的公社副社长抓住把柄，说常仁身上有资本主义的尾巴，砍的樟木是公家的，公函是假公济私，破坏了军民关系，违背了国家政策。这位副社长的揭发信到了政治部党委手上，成了追究常仁的罪状。

我相信常仁的陈情，他的违法乱纪是地方小官僚所逼。罪过都加在常仁身上，是不公平的，还会影响常仁的前程。我心中升起一股惋惜之情，决定去找处长，请求组织从轻发落常仁，这也是党章赋予我表达个人意见的权利。

我到政治部宿舍楼见到了处长，他那张惯常和颜悦色的脸已变得憔悴。他刚听完我表述的意见，心火陡起：“你的同情是不讲原则的。我们这里不是你那个部队，机关的干部战士都应是执行党政策的表率，谁敢容忍他这么胡作非为？”

“一个巴掌拍不响啊，对方有大错，常仁的错也不是蓄意的。”我辩解说，“他给全处做了那么多的好事，是不是请党委处理时多加考虑？”

处长更是震怒：“功过绝不能混同。常仁确实做了工作，可做的都是些忙忙碌碌事务性的。他有严重的农民意识，一有空就为他家的吃穿用忙活，很少坐下来学点政治。他的出事，损害了政治部的形象，为军队抹了黑，党委不会等闲视之，如果他再不吸取教训，就会毁掉自己的一生。”

处长要摆脱自身的不利处境只能如是说。我灰溜溜地回来给常仁通气，只说：“处长对你恨铁不成钢，这次给你处分会不轻的，你要有个思想准备。”

常仁心情淡定，说：“处长是我的顶头上司，政治部党委常委，又是当事人，他很快就要下到师里去任职政治部主任，他心情是复杂的。你就别再为我操心了，处分大小由他们去定，我会正确对待的。”常仁又说，“处长是进步学生到抗日根据地的，家庭是大地主，土改时父母给撵出家门。解放后，他还揭露他哥哥当过日伪税警。他背负着家庭的包袱，在政治上一直是小心翼翼地。如若思想不左，他就无法在政治机关生存。”

常仁对处长的为人有着这么透彻的认识，还能说他头脑里满是农民意识？我已无言安抚他，他只能听天由命。

五

晚上，处长来通知我参加明天“帮助”常仁的支部大会。我推辞说我有采访安排。处长神情严峻，说：“你必须参加。你们从西南参军的小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经常出毛病，你不要回避受教育的机会。”处长又说，“你和常仁朝夕相处了好几个月，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应得到清洗，你要大胆地揭发，帮助他改正才是。”

处长辞严语硬，我只能从命。

支部大会是在政治部会议室召开的，到会三十多人，济济一堂的处长干事们，都是从部队精挑细选上来的政工干部，才品和嘴上功夫更胜过一般人，往后他们回归师团都会出任科长主任的，这种会正是他们展示自己立场观点的大好机会。

会一开始，常仁先检讨。他做过党委秘书，过批判关有经验，他语音低沉，说自己的阶级思想阵地给腐朽的资产阶级占领了，成了俘虏。他还给自己带上一堆帽子，沉痛的声调真像在剖心革面，触及灵魂。处长检讨了自己的失职是对常仁的管教不严，对阶级斗争嗅觉失灵。更多的是指责常仁放松了思想改造，说常仁“是个小生产者，处处想捞一把”，忘记了贫下中农的根本，犯的 error 是严重的，应接受组织严厉的处分。

接下来便是一场急风暴雨式的声讨：“给军队抹了黑”“破坏了党风军纪”“是政治上的堕落”，“忘了自己的阶级，是背叛，是忘本”最后，支部书记总结说：“我们政治部党的组织必须是纯而又纯的，任何人都不能玷污……”

我一言未发。我是个军事干部，没有他们那么多“党文化”的修辞。我还有点做人的义气，绝不再给常仁着火的身上泼油。幸好，处长没对我追究。

会后，部党委作出决定，常仁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从这天起，常仁思想有了重负，见我时言语少了许多，他不再提自己的家事。不久，我的代笔结束，归队前我去向常仁辞别，常仁突发感慨：“我曾庆幸自己跳出农门又披上战袍，以为会给家人带来好运，没想到，解放后的困苦生活没有尽头……我受了处分，已是穷途末路了，可能还要回到大山窝里去修理地球，重新改造自己。”

他给师党委起草过不少处分决定，都要装进个人档案里。如今他也背起这副沉重的枷锁。

我同情常仁，又感到他做了一件蠢事。我安抚他说：“你摔了一跤，爬起来

接受教训就是了，不要多想，批判归批判，你是个有思想的人。”

常仁做了个黄粱梦，他的逆向思维撞到了南墙，党也容不下他，特别是称之为我军无产阶级思想堡垒的政治机关，只能毫不留情的切割了他这个异类。

大约十年之后，我被任命为军宣传处创作员，到任时，我才知晓常仁和处长都离队了。

处长转业到一个省辖市当了个工会主席。我百思不得其解，他左的思维是合乎建军建党利益的，功不可没，为什么偏偏在倡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日把他请走了？是不是他的出身不好成不了正果？

常仁给打发回到了荣昌老家，当了公社民兵指挥部的副政委。其间，父母双双亡故，他没有用棺木，而是用竹篾编织的鸳鸯盖住下葬的。文革开始，常仁以为自己翻身有了指望，他在公社最先举起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大旗，成了造反派头头，把他蓄积在胸中的愤恨凝聚成一腔烈火，喷向那个公社副社长。给副社长戴上高帽游街示众，组织大小会批斗，出够了一腔恶气。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思想救不了他，文革一结束，全国开始清理“三种人”，常仁在列，由于他出身好，又是转业军人，免了他牢狱之苦，削职为民，回到大山里当了林场工人，儿子在重庆打工，夫妻俩靠微薄工资相依为命。他给宣传处同仁来信说，我永世不会翻身了。❏

【评论】

从“仗义每从屠狗辈”说起

何与怀

流传这么一副对联：“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为明代在桂林当官的曹学佺所撰写。而这缘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故事是这样的。明朝天启二年（1622年），曹学佺被起用为广西右参议。当地皇亲宗室权贵经常纵容恶犬伤人，并以此为乐，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天，某权贵又放出恶犬，一个秀才躲避不及，被恶犬扑倒，眼看就要命丧狗口，这时路边冲出一名屠夫，手起刀落剁了狗头，救下了秀才。权贵一看，竟然有人敢杀了爱狗，这还了得！他们把屠夫捆绑送到官府，要判他死罪给狗偿命。曹学佺正好审理此案件，详细看过状纸后，判屠夫无罪，更判权贵要赔偿秀才医药费。权

贵自然不服，便心生一计，暗中重金贿赂并威逼恐吓秀才改口供，同时要求重审。开堂再审时，秀才果真改了口供，说那天是在和此犬玩闹嬉戏，是屠夫恶从胆边生杀了此犬，要屠夫给犬偿命！秀才如此陷害屠夫，曹学佺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大骂道：人证物证皆在，况且屠夫救你一命，你不思回报，反要置他于死地，伤天害理！说完就要衙役杖击秀才，秀才挨不过，不得不招认是做假口供。于是，曹学佺重新判决：屠夫无罪；秀才恩将仇报，革去功名，给权贵当狗去！审理结束后，曹学佺愤然在案卷上写下“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副名联。

不过，也有许多人质疑曹学佺这副对联。他们说，曹学佺是在一种气愤的状态下写的，少不了有点偏见。也有的说，人们平时似乎对于“屠狗辈”的道德要求比较低，所以一旦他们做了一件“仗义”的事情，就显得很特别有正义感。而对于读书人的秀才，道德期望比较高，一旦一个不仗义，马上会被喷：“瞧瞧，还知识分子呢，一点不讲义气。”有人甚至这样为秀才开脱：一个人能不能“仗义”通常与自身条件有关。“屠狗辈”相对处于社会底层，顾虑比较少；而“读书人”经过多年教育，顾虑多，更会权衡利弊关系。这样的开脱显然近乎无耻了。

事实上，“秀才”仗义的应该说还不少。最近就有现成的例子。

6月20日，湖北大学网站发布消息：经学校研究，决定给予梁艳萍记过处分，取消其研究生导师资格，停止教学工作。在官方消息发布不到两个小时，武汉作家方方就在个人微博发文，斥责湖北大学给中国的大学丢脸了，也给湖北丢脸了。她严词痛斥：极左团队和网络流氓们，你们绑架了湖北官方，绑架了湖北大学，绑架了宣传部门，绑架了出版部门。我要看看，同时也请大家看看：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大学？你们会不会绑架所有部门？你们会不会绑架整个中国？你们会不会绑架以亿而计的中国人？

一如既往！这就是方方。她的表态保持了自己的一贯风格。

这是被“伟光正”的“党”处理啊。几十年来，在中国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一个人一旦被“党”处理了，大多数人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落井下石已经很难得了，更别提公开发声了。这样的例子多得数不过来。事实上，梁艳萍教授被处理后，中国网络上就立时一片欢呼声。身处风暴中心的方方发出的声音，显得很抢眼。这种豪爽让很多人汗颜，也让人感慨：方方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湖北大学梁艳萍教授，也同样是一个讲义气的人。

3月23日，当方方因为她的武汉封城日记被全国四面八方大肆攻击的时候，梁艳萍撰文《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为其辩护。梁艳萍说：作为一名身处疫区的作家，方方的追问是使命感的追问，良知的追问，也是批评者的追问。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没有批评的声音是可怕的。

梁艳萍教授的辩护正气凛然：

批评无自由，则赞美就毫无意义。要知道，问责是共和国宪法所赋予公民的权利。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了后现代，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思维方式、管理模式总不能永久地停滞于前现代，总不能维持一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让人蒙在鼓里，不知就里。采用对上奉过去，对下顺过去，得过且过，忽悠一时算一时吧？更不能象鲁迅当年直刺的那样：“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除了对官员治理的追问，方方的写作还有对出自公共卫生、疾控等领域专家之口的“可防可控”“人不传染”等酿成灾祸的言论的追问。当病毒肆虐之下，不实事求是，每人隐匿一点点，遮蔽一点点，含混一点点，大祸就酿成了，就降临了，最终从九省通衢，蔓延世界……悲乎！

梁艳萍教授对封城日记的挞伐者极其厌恶。他们从一开始就排成了长队，挥舞着十八般兵器，喊着骂着，朝向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恶狠般地扑来。梁教授嘲笑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他们都从蛰伏中出来，换件衣服，披个马甲，又上阵了。他们犹如流氓病毒一样在寻找宿主，企图寄生于其上，多蹭那么一点含赵量，或者到时候去邀功，得以投入到“胜利叙事”的狂欢中。梁教授连用“可耻！很可耻！可耻之极！”来形容这些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人。

在方方事件中，这种可耻之人——不管是“屠狗之辈”还是经过多年教育的“读书人”——实在太多太多了。

例如忘恩负义的“敲锣女”李丽娜。2020年2月8日，武汉疫情高峰时期，她在自家阳台上敲锣哭诉，呼唤大家救她染疫但无法入院的母亲。方方以极大的同情在日记中讲述了这个故事。后来敲锣女的母亲住院了，得救了，故事也随着方方声援日记传到世界。事后李丽娜写了上下两篇《武汉敲锣记》，方方转发了上篇，并配文说：“永远要记住武汉人的奋斗，还有无数人的相互帮助。这些事都必须记录在案。”但是，这次敲锣女却翻脸了。看到方方日记受到全国许多人

洪水般批判为“抹黑国家”，敲锣女也指责方方把她“当武器使”，“拖她下水”，给她“带来伤害”，完全恩将仇报。

再列举几个争先恐后投入“胜利叙事”狂欢中的可耻者：

3月18日，一篇三千多字的致方方的信发表在网上，写信者自称是十六岁中学生，信中劝方方“吃人饭，要说人话，端别人碗，要服人管”。

4月9日，极左网站《红色文化网》刊登笔名“十念生”的文章，把方方日记在全球发行形容为“欧美的一把屠刀”，而他“仿佛看见这把屠刀已经举起”。

4月14日，武汉市区出现一张公然威胁方方的大字报，作者自称“乡下农人”。这张以《告方方书》为题的大字报骂方方“吃人血馒头”，“享受着种种国家体制内优好的福利和待遇，却干着严重伤害构陷国家的事情”，“要求方方把自己的全部财产交出来，削发为尼或者以死的方式谢罪，否则，自己将会以‘侠义方式’，对方方你进行‘文攻武伐’”。

4月16日，曾在比武中被徐晓冬十秒打趴的太极雷雷，在社交媒体录制视频，称要“诚邀武林同道”，用拳头教训方方。

4月21日，《今日头条》刊登名为“左笔书法钱诗贵”的文章，称有南京的雕塑家朋友认为方方是“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不折不扣沦为了汉奸”，要在秦桧墓旁给方方立跪像。

北京大学张颐武教授也亲自出山，以居高临下之态，反而攻击方方“丧失做人的底线”。《环球时报》胡锡进总编则代表“中国人民”，发文称，“在未来的风浪中，中国人民，包括那些曾经支持了方方的人，将用我们多那么一分的利益损失来为方方在西方的成名埋单。”……

一个曾与本城人共生死，在大家最难的时候记下本城人点点滴滴的作家，现在竟然受到全国性的恶毒攻击，这当然不只是个别人忘恩负义，不能单单看作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故事”，一个“农夫与蛇的真人版”。这是极左团伙集体作恶，群起而攻，制造并形成汹涌舆情，背后又显然有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相助。据揭露，他们这次为了胁迫湖北大学处理梁教授，甚至点名威胁湖大校长：你不处理梁艳萍，我们就揭发你什么什么。这一招明显有效。另一招就是拉大旗做虎皮。新近就传言：中纪委第几巡视组进驻中国作家协会，对方方已经有了处理结论；又说军方已经公开斥责方方日记……诸如此类，全都写得斩钉截铁，煞有介

事，来头越大，似乎越证据确凿。而那些“大旗”，似乎也很乐意去充当“虎皮”。

梁艳萍教授在她的《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是方方》的文章中说：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直面对冲，迎头相撞。我们不能留给后代美丽的符号，至少我们可以留给他们可能美好的希望！

梁艳萍教授为方方的辩护掷地有声，但又相当悲壮。毕竟，不能不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中，在强大的政治思潮势力的挤压下，她肯定只能是败方。迎头相撞，结果头破血流。类似她“下场”的，之前已很多，跟着可能还有：海南大学退休教授诗人王小妮、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川鄂、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谭邦和、南昌大学教授静娅、河北省开滦一中校长张丽钧……等等。这些人经过多年教育，是顾虑多，但顾虑的不是自身仕途；他们是更会权衡利弊关系，但权衡的是国家民族的大利大弊。

那些阿Q们、赵多多们、王秋赦们是屠狗之辈吧，他们并不因处于社会底层没有顾虑而“仗义”。他们愚昧蛮劣根本不知何为“仗义”！而封城日记的挞伐者、处分梁艳萍教授的决策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了，甚至是“宣传”、“教育”领域的当权者，可却正是因为受过“教育”而懂得如何罗织罪名。他们是权贵的看家狗，是良知的刽子手。

显然，仗义不仗义，负心不负心，跟受教育程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关键是一一接受的是什么“教育”！权贵们权贵来之不易，他们老谋深算，金睛火眼，深知驭民术之关键。君不见，堂堂清华百年名校的十六字校训就被拦腰砍去一半，剩得八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另一半，“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早已不知所终！而没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只能是虚妄之语，与古人所望大相径庭。

说到这里，实在应该进一步想想：如果当年的广西右参议曹学佺大人和权贵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么，一个可悲可叹的情景绝对百分之百出现：管你屠狗辈也好，读书人也好，所谓“仗义”，所谓“负心”，全都得倒转过来！

但叹息也罢，悲哀也罢，这正是今天人们看到的现象。权贵们正为他们的“胜利叙事”而弹冠相庆，即使是一时的成功。❏

6月30日于悉尼

谁在分裂党？

——《绕不过去的点》读后¹

鲍 彤

中国共产党有许多烈士。有的在白色恐怖下被处决，有的死于红色恐怖，即死于本党的锄奸、肃反或历次路线斗争。只要党内党外腥风血雨不止，这两种烈士就会大量地生成。前者如“二七”大罢工中，被北洋军阀处死的工人和律师；后者包括党国领导，如刘少奇、林彪、彭德怀，以及自己的情报工作人员潘汉年等。到底哪一种更多些，只能由中共自己总结，旁人只能估计。大致夺取政权期间，第一种烈士居多；夺到政权之后，第二种烈士更多。还有一种非常的烈士，是在红白两色恐怖共同镇压之下遇害的。左联五烈士和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其他亡灵，便属于这非常之一种。

一

事情可以从中国工运的一位拓荒者说起。

他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书斋命名为“亢斋”，因为他把德文的共产主义者Kommunistisches译成了富有感情和理想色彩的汉字“亢慕义”。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宣布，把他和李大钊一起接纳入党。书记李大钊缺席时，他受命主持中共北方区委的工作。他不愧是李的学生和副手。从“三大”到“六大”，连续四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把中国共产党送上国际舞台的平汉铁路“二七”总罢工，是这位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兼平汉路总工会党团书记在现场主持全程。当工运几乎是中共在白区的唯一阵地时，是他担任着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被“永远开除党籍”，终于隐姓埋名走进大学任教之后，他仍然不能忘情于抗日救亡，把工作做进了张学良将军的司令部。

他就是罗章龙。

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瞿秋白、周恩来采取了调和态度，罗章龙和他的同志们则坚定地要求停止立三路线。1931年1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

¹ 此文原为作者为《绕不过去的点》一书写的前言，因该书在香港出版未果，此序遂被搁置至今。本刊将此序改为书评。谨此说明。

来到上海，用15个小时开了一个六届四中全会，“改造”并建立了新的中央（“临时中央”）。瞿秋白、周恩来屈服了，但罗章龙和他的同志们是坚定的，他们坚定地反对破坏党章，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反对由共产国际任命非中央委员王明来充当党的核心。他们坚持：中国革命应该由四万万中国人做主；共产国际无权越俎代庖。因此之故，罗章龙和他的同志们被“永远开除党籍”。开除这批中央委员是党的决定，由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宣布，并由周恩来补充起草，形成书面文件。

被开除的，除了罗章龙，还有许多重要人物。当时白区工作和工人运动中的骨干，从江南省委（以上海为中心）、北方区委（以平津为中心）到全国总工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在清洗之列。在白色恐怖下成批地开除地下组织的骨干出党，是秘密工作的大忌，等于把开除和被开除的双方同时暴露在统治者的屠刀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锄奸”，是中央特科的神圣任务。被成批开除的同志沦为“锄奸”对象，是他们的必然遭遇。这些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对地下工作者都不陌生。米夫懂得，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王明、周恩来、向忠发、顾顺章懂得，罗章龙和他的同志们也懂得。非常委员会的革命者不屑向共产国际代表低头，不屑向临时中央屈服，也不屑向统治者告密乞怜。为了在被开除之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选举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其中有罗章龙，史文彬，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其中在左联工作的，有柔石、冯铿、殷夫……几天以后，当江南省和上海市的非常委员会的骨干集会时，被人出卖，除罗章龙和另一人（因公迟到或早退）外，集体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由于公共租界的特殊处境，营救本来是有可能成功的。但临时中央幸灾乐祸，见死不救。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临时中央机关内又出了四名叛徒，不去告临时中央的密，却去指认非常委员会的被捕者。被捕者中，中央委员、省委委员之类身份一经坐实，事情就无可挽回，被引渡到国民党的龙华警备司令部。接着，北方的非常委员会也遭摧残。

非常委员会事件，是中共在白区遭到的最严重的一次大破坏，被肉体消灭的领导骨干的级别之高和人数之多，超过了此后中国共产党政治局常委主席向忠发和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所导致的损失。结果如所周知，“白区损失百分之百”。

二

这群革命者是被红色恐怖和白色恐怖联手歼灭的，遇害的消息也被红白双方联手窒息。龙华警备司令部镇压他们时，秘密关押、秘密处决。共产国际和中共临时中央，对龙华暴行不抗议、不声讨，对烈士的殉难不发丧、不哀悼，心安理得，若无其事。

如此过了三百六十五天，又过了三百六十五天。

1933年，在英烈们殉难两周年的时日，鲁迅发表了《为了忘却的纪念》。在“吟罢低眉无写处”的恐怖下，鲁迅用淡涩的笔触，写了他和殷夫仅有的几次见面，写了柔石及其朋友冯铿女士，记下了只见过一面的胡也频，也记下了素未谋面的李伟森的名字。这位李伟森，又名李求实，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也是非常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有幸被鲁迅写出姓名的这五位，都在左联，和鲁迅谊在同事；但鲁迅所纪念的，是全体殉难者。他逐字逐句抄下了柔石于1931年1月24日在狱中用化名写给同乡的信，其中有这样一句：“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此案累及太大”。鲁迅用史笔刻录了“一个可靠的消息”：“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在“无写处”中迸发出沉痛的控诉，升华为对亡灵的永恒的纪念，打破了长达两年的白方严密封锁和红方蓄意沉默。

三

其实鲁迅对非常委员会这桩公案不太了解，他是用良知和热血秉笔直书的。鲁迅是当时左翼文坛和左翼青年的旗帜，由他亲自护送共产党的异己分子进入革命者英烈祠，党之领导的狼狈困窘可想而知。

在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人们看到了一种所谓“区别对待”的特技处理：一方面，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另一方面，是“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林育南等之所以有幸被超度为第三类烈士，是因为他们太不幸了，遇害于敌人的刑场；罗章龙、史文彬等之

所以必须万劫不复地永远留在地狱，是因为他们太侥幸了，逃脱了敌人的罗网。

向政敌头上泼脏水，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拿手戏。60年代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携手给他们的战友刘少奇加过“叛徒、内奸、工贼”的冕；30年代的国民党，用伍豪（即周恩来）的名义，发表过“叛党启事”，周直到临终，仍在挣扎着力辩其无。国民党特务机关也没有放过罗章龙，他们用罗的名义，刊登了一份“叛党声明”，但罗章龙的清白，至少比周恩来更容易得到证实——1933年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的罗章龙，是国民党元老蔡元培亲自营救出狱的，哪里用得着写什么“叛党声明”！顺便说一下，有些党史数据，不知出于什么目的，把罗由中央委员降格为“候补”委员。至于这篇决议案，虽经再三推敲润色，但上述有关罗章龙的那一句断语，非但内容是捏造的，而且时序颠倒，逻辑混乱。既然说“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可证四中全会上的欲加之罪纯属预卜先知的神话；《决议》硬说罗是“后来……而被永远驱逐出党”，但是，连《毛选》也无法否认，他被开除的时间，确确实实，明明白白，就在“1931年1月”，哪里是什么“后来”！

四

“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好比遭天王猜疑的石达开，从此不见容于天地之间。除了迅速认错的人得以继续入选七、八两届中委以外，凡在红白二色恐怖迫害下挺身坚持的，处境都可歌可泣。如，六届中委王仲一，最后仍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逮捕，在北京遇害。六届中委张昆弟，后来在洪湖苏区被害。六届中委韩麟符，回北方后，在京津冀察独力主持农运，组织武装，遇刺而亡。史文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也在赴延安途中突然死去。罗章龙的胞弟罗章凤，冒着生命危险，营救了六位同志出狱，自己则因向忠发叛变而牺牲，时年24岁。

幸而得到蔡元培奥援的罗章龙，是位长寿老人，于1995年去世。罗是毛泽东的旧侣，所谓“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秋收起义时，奉中央调遣，两人又在一起工作。为了“争百年之是非”，50年代罗章龙要求中央复议前事，毛泽东当面表示“那时我不在上海，诸事不大清楚”；但到了晚年，当然，一方面，仍是“诸事不大清楚”，另一方面，一如既往坚持1945年

决议，把罗章龙列入党内“十大错误路线”，到死没有松过口。¹

文革破产后，许多冤假错案得以昭雪。胡耀邦亲自关注罗章龙非常委员会一案。邓小平不同意平反，继续守住“罗章龙分裂党”的口径。那是1980年3月，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邓小平自问自答：“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把彭德怀、刘少奇等解脱后，邓抓住罗不放，说，“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邓小平这十个字，一方面，终于承认第一个历史决议中“真正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无中生有，站不住脚，非摘掉不可；另一方面，坚持“分裂”罪名，继续为“永远驱逐出党”张本。邓小平同六届四中全会没有瓜葛，而且和罗章龙关系密切，他为什么也脱口而出，判定罗章龙“分裂党”？

同样的语言还可以从刘少奇那里找到。早在40年代初，刘在华中党校讲《组织上的和纪律上修养》，就举出罗章龙，作为反党的三大案之一。他说：“罗章龙、张国焘、陈独秀等都以列宁不服从第二国际组织第三国际为借口，来反对中央，破坏党的统一，这是完全错误的。……列宁在那个时候是对的，但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今天这样做都是不对的。”为什么？刘少奇只有两条理由：“因为第一，那是列宁，这是你。第二，列宁反对的是第二国际，你反对的是第三国际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最后的结论：“总之，在第三国际成立以后，想以过去第二国际时代反对第二国际的办法来反对第三国际，那是错误的。因此，有些同志以上级领导不正确为理由，不服从组织，那是不对的，是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是否认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绝对性，把它看成了相对的有条件的东西，这就不能保证党的统一。不论对与不对都要服从，——看起来，这好像有些用蛮，但是要把几十万党员组织起来，而且维持党的统一，不用些蛮有什么办法呢？”

公允地说，刘少奇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他们处理日常问题，并不一味用蛮，一味不讲道理；但是，面对“罗章龙、张国焘、陈独秀”这些个重大、敏感、不可能说清楚，或不愿意说清楚的问题，“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绝对性”立即成为压倒一切的法宝，正如他所说的，“不用些蛮有什么办法呢？”在这点上，米夫、王明、毛、刘、邓，都一样，没有区别。

¹ 鲍先生写到此处，建议《谁在分裂党？》的资料集中加入毛1970年代南巡讲话的相关内容。现查中共中央1972年3月17日转发全党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中有毛说道：“1930年到1931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搞成。”——无文注。

五

毛泽东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干脆把党的纪律归结为四个“服从”。当然，不是服从人民，不是服从法律，也不是服从真理；而是服从党。服从党就是党的观念，就是组织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列宁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君为臣纲”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组织原则的的确确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分水岭，因而也的确确是鉴别独裁政党和民主政党的试金石。正是民主集中制，使20世纪许多悲剧和闹剧，不断在第三国际的势力范围内重演。

现代政党的生命在于民意。每一位领袖，每一个政党，都天然地即自发地以民意为导向，受民意鉴别，竞长争高，优胜劣汰，流水不腐，生生不息。政见的分歧，领导层的更迭，都是民主制度下的常态，用不着大惊小怪，无所谓“反党”“叛党”“分裂党”，没有这种概念，更没有这种罪名。

实行组织原则或“民主的集中制”的党则相反。组织原则就是党权至上，党的领袖至上。无怪俄国革命之父普列汉诺夫，早在十月革命后的几个月，就准确地预见到，“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为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的专政，维持领袖的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普列汉诺夫因此而深悔自己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上，当列宁和马尔托夫争论（组织原则）时，“我支持了列宁，因此终于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产生。”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所谓布尔什维克主义，就是由一个领袖指挥一个党，去夺取国家权力，并在得手后，由它去统治一个国家。领导决定一切。政纲一经宣布，就是绝对真理，反对不得。领袖一旦上台，就是终身至尊，反对不得。宁可一时的小错延续为长期的大错，也不可触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绝对性”这个僵化的“正常”秩序。组织原则的作用，在于排除异见的露头，扼杀新人的挑战，如果有，就谥之为反党，谥之为分裂。

列宁党的组织基础，沿袭了中世纪行帮或密谋会党的戒律，背离文明的主流，但能跟独裁政治、愚民政策、法西斯恐怖同流合污，配套成龙。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独裁，并不是关于个人品质的偶发事件，而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绝对性”的必然产物。党权高于一切。服从党，就是真理，而且是最方便、最安全、最有效的万能标准和绝对真理！虽然在民主制度下没有“反党”之说；但在民主集中制

的组织中，在党权至上的社会里，不必问是非黑白，反党一定有罪。这，就是“道理”。这，就是绝对不讲道理的“道理”。对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一切在位的党魁来说，它跟呼吸一样，是一种求生的本能。要求他们撇开组织原则来讨论是非黑白，等于与虎谋皮。

真理是自由的。它的探索和存在，传播和实现，都离不开自由。但在是非黑白必须恭请党权批准的地方，没有道理可讲。

1945 年历史决议是全面神化毛泽东的起点；若说决议有错，岂不在毛的脸上抹黑？六届四中全会是刘少奇进入政治局的初阶；若说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强加给中共的，把刘置于何地？1980 年刚刚当上“第二代核心”的邓小平，正待凭借绝对权力展翅高飞；他哪能自决堤防，开出反党无罪的缺口？

胡耀邦有赤子之心，喜欢讲道理，论是非，总结经验。邓小平的专利是，只拍板，“不争论”。他有成竹在胸，党即真理。他终于举重若轻，快刀斩乱麻，对“百年之是非”作了十个字的了断：“罗章龙另立中央，分裂党。”

六

无文先生穷十余年之功，全身心投入这段血的历史，在茫茫史海中爬罗剔抉，理出了几十万字的珍贵史料，供世人奇文共赏、共参、共证。

他的工作很有意义。

这意义，我认为，不在于能否成功地步鲁迅之后，把“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送进中国共产党的英烈祠。

我不认为，坚持“六四”镇压有理的人，具有分清“百年是非”的理性。

我不认为，每年每月都在制造冤假错案的人，会有主持正义的良知。

罗章龙在“解放”之初和文革破产之初，曾经分别致书毛、政治局常委会，要求“复议”前事。他同当时许多凡人一样，相信两位有权有势的人有可能主持正义。在得到“诸事不大清楚”的推搪之后，特别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后，罗从此不找毛。在邓小平拍板“分裂党”之后，尤其在邓镇压学生和市民之后，罗从此不找邓。“耻与为伍”“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是谓不知言”，罗章龙熟读诸子百家，胸中自当烂熟。“争百年之是非”是有尊严的。看透党权的本质之后，我不认为，亢斋老人会有回归的情趣和兴致。

已经进入殿堂的英烈，当年都和民众站在一起，抛头颅、洒热血、杀身成仁、反抗专制。殷夫所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是我辈同时代的中国人的箴言。裴多菲的原文想必极美，殷夫译时用的也不只是笔墨，他在再创作，用心、用血，把这首诗译成了中国人反暴政、争自由的浩歌。我毫不怀疑，诗人和他的同志们，领略了一党专政赫赫的业绩，目睹着弱势群体血泪的处境，九泉有知，早已抛弃了充当着点缀的殿堂，自由地奔向和拥抱维权的民众。

至于“吟罢低眉无写处”的鲁迅，我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能够终于找到“写处”。我只知道，解放后的北京、上海、厦门、广州，在他去世60年后，“写处”越来越难找。“百花齐放”的主宰者毛泽东早在1957年7月7日就断言：他鲁迅要么不说话，要么去坐牢。这话当然没有刊入《毛泽东年谱》，好在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罗稷南、赵丹、黄宗英，当时在场，听清楚了，记下来了。所以我想，这本书的价值，在于揭示和启发——用血的史料，揭示党性和真理的关系，启发人们去思考有现实意义的诸多问题。■

【序跋】

国际共产主义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绕不过去的点》序

朱 正

无文小友将新著《绕不过去的点》的电子文本发来，要我作序。趁便说一点我对一些相关事情的看法，向无文小友和各位读者请教。

罗章龙二十出头即投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后来做到中共中央委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知名人物。我想说的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个什么样的运动。

1917年11月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攫取政权以后，它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们为了摆脱俄国在世界上所处的孤立处境，派人到各国去寻求同情者、合作者，建立共产党。这样就有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说是帮助各国开展革命运动，而首要的、最高的目的是维护苏俄的安全和利益。

派来中国的是维经斯基。他找到了陈独秀、李大钊，牵连出毛泽东、罗章龙这些人。这些人所以能够接受他的说辞，愿意同他合作，是因为这些人早就想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外患不断的现状，可是又痛感到自己的无力；现在有一个国际组织愿意帮助自己，当然就乐于跟着走了。他们帮俄国做事，却自以为对中国有益。大家知道：张作霖绞死李大钊，并不是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是俄国利益的代理人，是外国间谍。

1929年中苏两国因为中东路管理权限出现分歧，苏联派出重兵入侵中国。那时瞿秋白正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10月7日斯大林提出组建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派到满洲去作战（《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八卷，第187页）。瞿秋白就按照斯大林的意见，指派黄平当党代表，刘伯承当司令，到海参崴召集了许多华工，多数是开金矿的华工，向他们做了一些宣传鼓动工作，组建了一支有三四百人的队伍（黄平：《往事回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9—71页）。1930年1月，瞿秋白写了一篇《中国的苏维埃革命》，热烈赞颂苏联的这一次军事行动。他把这事和国内的一些工人罢工、江西红军的反“围剿”战争联系起来，说：“中国工人群众的这些示威和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苏联的远东军防御满洲军阀而打的胜仗，是同时的。这并不是偶然的事。中国的工农把苏联远东军的胜利，认为是自己的胜利。普通的中国工人都高呼‘俄国的苏维埃万岁，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的红军万岁，加伦（布留赫尔）的红军万岁’呢。”（《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六卷，第824页）他不经意泄露一个秘密：按性质来说，毛泽东的红军和加伦（布留赫尔）的红军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苏联的利益作战的。

应该说，并不是只有瞿秋白一个人是这样看，整个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看的，1960年9月19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的时候，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人很了解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请苏联同志回想一下‘中东路事件’。苏军在中国东北消灭张学良的两个旅。我们就起来维护苏联，口号是‘武装保卫苏联’。所有敌人的机器都开动起来骂我们是苏联的走狗。”苏斯洛夫回答说：“我们对此表示感谢。”（见《阎明复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625页）种种事实证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说的“国际主义”，就是俄罗斯民族利益的代名词。

在我看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上最善于宣传、最善于粉饰掩饰、有最

多的秘密，而且保密工作做得最好的运动。它不但要欺骗党外的群众，就是对自己人也要隐瞒。例如有一个时候，共产国际曾经有意和吴佩孚合作，1922年8月19日越飞给吴佩孚的信中说：“您善于将哲学家的深思熟虑和老练果敢的政治家以及天才的军事战略家的智慧集于一身。”（《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一卷，第99页）这样的称颂也不可谓不高了。越飞甚至有一个异想天开的想法：让孙中山和吴佩孚这两个互有很深敌意的人合作，孙中山任共和国总统，吴佩孚任军事部长和总司令。（同上书，第117页）

为了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拉拢吴佩孚的方针，陈独秀就要李大钊通过他的同窗好友白坚武去做吴佩孚的工作，在若干具体问题上还颇取得了一些成效。当吴佩孚看到1923年1月26日签署的孙中山与越飞的联合宣言，知道俄国已经决定同他的宿敌孙中山合作，立刻放弃了联合俄国的想法，2月7日，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的罢工，成为共产党的敌人。可是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一段文章说到拉拢吴佩孚这事：“当时中国共产党确有一种机会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以现今共产主义叛徒陈独秀做代表，他当时对于吴佩孚确有很大的幻想，而有所谓‘孙吴联合’的主张。北京方面李守常同志确是同意此种主张的。”（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7页）

邓中夏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竟也不知道促使孙吴联合是共产国际的主张，而以为是陈独秀提出来的机会主义的主张，也可见这事是在严格保密的条件下进行的，不是参与其事的，就是中央委员也不让知道。由于对许多事情真相的刻意隐瞒，给人们研究这一段历史增加了许多困难。在这个意义上说，罗章龙把历史真相留给后世，就太有意义了。

罗章龙是因为反对共产国际操纵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而被开除党籍的。这真是冤枉。毛泽东不也反对四中全会的吗？按照毛泽东的意思通过的历史决议更把四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党史又说，罗章龙还犯了“另立中央”的错误。其实“另立中央”的事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发生过。例如1927在武汉召开“五大”的前夕，当时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机关还在上海领导三次工人起义，武汉的事情就是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个人商量决定，可是没有人说这是“另立中央”。又如红军长征期间，在瑞金开过五中全会的中共中央随军行动去了。因为电台已经破坏，共产国际找不到他们，于是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

生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活动。这两回都是共产国际认可的，甚至就是共产国际自己做的。罗章龙这回组织“非常委员会”却不同，而是反对共产国际的胡作非为。所以那时要开除，多年之后仍然不许回到党内来。

为此，罗章龙也许有些感到委屈和失望吧。可是今天来看，他那时被党开除，不准他回到党内来，却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幸事。中国共产党占领全国以后，发生了多少事情：出兵朝鲜、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派坦克车去占领天安门广场。罗章龙死后发生的事情就不说了。如果罗没有被开除，或者恢复了党籍，就难免或深或浅地卷入其中。我在《新湖南报》工作时候的老社长李锐先生在为我们报社右派的回忆文集《1957 新湖南报人》写的序言中说：“我想，假如那时我还没有调离报社，对于上级布置下来的反右派任务，也没有可能顶着不办吧。当然，我不会去制造这种‘全国第一’的大案，但也不能够不按照上级下达的指标，比如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的‘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424 页），划几个右派分子交差吧。”尽管李序对反右派斗争完全持批判的态度，他还是说了这句大实话。罗章龙在党外，没有了作恶的任务和权利，所以他一直到最后，一双手是干干净净的，一颗心是平平静静的。这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说句题外话，中共占领中国，“占领”二字不是我的杜撰。毛泽东 1949 年 10 月 15 日致周世钊的信中说：“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345 页）我看到过这封信的真迹。那时周世钊的女儿周孟瑜也在新闻干部训练班受训，她很高兴地把这封信拿来给同学们看。

鲍彤先生谈到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纪念》，“也许鲁迅对非常委员会这桩公案其实不太了解”，当然是不太了解。在鲁迅生前，没有人发表这件事情的真相。我写的《鲁迅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年，第 288—289 页）根据的就是罗章龙的《逐臣自述》，才说清楚了这件事。我作为一个受益者，衷心感谢罗章龙先生、无文小友做的工作。我更愿意以我的实例向重视史乘真实性的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读者来信】**1. 张从纠错**

《聂元梓是怎样一本书》有两处错字：36页，聂元梓调到北学，应为北大，或北京大学。52页，中央文革办事组王光宇应为王广宇（含页下注解）❏

2. 张晓良指漏

277期23页有图注：1963年11月，毛主席接见参加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第四次（扩大）会议的成员。平时从未见到冯友兰露出这样灿烂的笑容。但未见图片。❏

3. 蒋健匡正

277期13-14页，将李震“自杀”的缘由简单化了，何况毛泽东生前的党中央并没有给李震的“自杀”定性，给李震定性“畏罪自杀”是华国锋上台以后的事情。另外，据我所知，李震子女并不认同“自杀”说。

15页，将李德生说成在1970年就已经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不符合史实，李是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

4. 冯锡刚勘误

277期所刊张晓良提供的照片，文字说明有误，左3非关锋而是林彪。此幅照片曾为江苏一家出版社所出版的有关毛泽东的书籍刊用，此书出版于八九十年代之交，但书名已忘却。❏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方惜辰